

全球對話

15.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三期, 以多種語言刊出

與 Joan Martínez-Alier
談社會學

Volodymyr Shelukhin

摩洛哥社會學與2025年
ISA 論壇

Adbelfattah Ezzine
Abdellatif Kidai
Driss El Ghazouani
Kawtar Lebdaoui

開放科學

Fernanda Beigel
Eunjung Shin
Jae-Mahn Shim
Ana María Cetto
Sarita Albagli
Ismael Ràfols

理論觀點

Gabriel Kessler
Gabriel Vommaro

議題開講

- > 海地：國家的暮色
- > 繪製衝突：形構美洲「綠色」開採的相關爭議
- > 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簡要圖解
- > 在危機和不確定時代中的拉丁美洲與哥倫比亞社會學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5卷 / 第1期 / 2025.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編輯的話

今年《全球對話》今年已經十五歲了。我們能走到今天，得要感謝 Michael Burawoy 的引領，最一開始的刊物，甚至是以手工的方式製作的。2010年9月，他在第一篇編輯的話裡面這樣說：「我們期望這份電子報，能夠成為全球社會學社群的思想交流中心」。經過2014年末於日本舉辦的第十八屆ISA 世界大會，《全球對話》不再只是電子報，而成為了一份期刊。慢慢地，《全球對話》從最初僅以四種語言發行，變成了涵蓋十七種語言、結合線上文章和每年四期（後來是三期）的一份刊物。在這個過程中，刊物的設計也越來越專業，一直參與《全球對話》製作的 Lola Busuttil 和 August Bagà 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2017年底，Michael Burawoy 於《全球對話》第7.4期編輯的話當中，撰寫了《全球對話》的簡史，我非常推薦大家閱讀。在那之後，[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接下了這份任務將《全球對話》以現今的運作模式整合。於他們為《全球對話》掌舵的五年之間，文章內容變得更加豐富，同時，刊物易於閱讀、深具批判性且觀點多元的風格也保留下來。2023年，在 Carolina Vestena 與 Vitória Gonzalez 的協助下，輪到我站上了主編的位置。我指出了三項挑戰：以 ISA 為核心，同時不僅止於 ISA，來建構公共與全球社會學；重組《全球對話》、增強穩定性；重新定義刊物的溝通與傳播策略。

我們在許多面向上有了進展，也還有很多尚待進行的地方。趁著《全球對話》十五週年，以及即將於拉巴特舉行的第五屆 ISA 社會學論壇等機會，我們將能進一步面對這些尚待處理的任務。在今年的刊物裡，我們會討論公共與全球社會學的一些主要挑戰，除此之外，我們也希望能和對這件事有興趣的人展開各種對話。《全球對話》必須能夠於全球動盪中，針對時代危機給出全球性的回應，並且要在不同的現實與學術文化間架起橋樑、提出知識與政治的替代方案。

本期打頭陣的是由烏克蘭社會學家 Volodymyr Shelukhin 擔任主訪人、訪談加泰隆尼亞學者 Joan Martínez-Alier 的文章。Joan Martínez-Alier 是政治經濟生態學領域的關鍵人物之一，在這次的訪談中，兩人將會檢視烏克蘭十九世紀最為著名的學者——Serhii

Podolynsky 的遺緒，並討論社會理論的環境轉向。

第一個專題，概略地介紹了摩洛哥的社會學，文章主題涵蓋摩洛哥社會學的制度化、殖民地與外來社會學學派之間的緊張關係、摩洛哥社會學學派的出現，以及現今較常被討論的學者、議題與社會學實踐的趨勢。ISA 學會論壇將於明年7月6日至11日在拉巴特舉行，我建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2021年第11.3期《全球對話》](#)中，由 Adbelfattah Ezzine、Abdellatif Kidai、Driss El Ghazouani 和 Kawtar Lebdaoui 等人組織的馬格里布社會學專題。

第二個專題，將帶領我們由開放科學的角度思考公共與全球社會學。本專題由曾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放科學諮詢委員會會長的 Fernanda Beigel 編輯，主題涉及：開科學與包容、跨文化之間的關係（F. Beigel）；開放科學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特殊性（Eujing Shin 和 Jae-Mahn Shim）；科學去商業化的可能性（Ana María Cetto）；公民科學、與社群科學對話、參與式科學、公眾參與科學等趨勢（Sarita Albagli）；以及開放科學、關懷和知識正義的關係（Ismael Ràfols）。

在理論觀點中，兩位阿根廷的頂尖社會學家 Gabriel Kessler 與 Gabriel Vommaro，嘗試以拉丁美洲現實的經驗研究為基礎，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概念框架，來回應「如何研究政治極端化？」這個問題。

最後，是本期的議題開講。第一篇文章，是由海地學者 Jean-Marie Théodat 撰寫，他清晰地分析了加勒比海國家的災難背後，呈現出怎樣的邏輯。此外，Mariana Walter、Yannick Deniau 和 Viviana Herrera Vargas 則調查了美洲的25個涉及綠色剝削主義的衝突案例。最後兩篇文章，則是關於拉丁美洲社會學，包含 Miguel Serna 對拉丁美洲社會學學會現況的描述，以及拉丁美洲社會學學會大會，於2024年11月在多明尼加共和國舉行的最後一次大會中發表的宣言。

請繼續關注我們的下一期刊物。《全球對話》萬歲！感謝您！■

Breno Bringel，《全球對話》編輯

PS：當本期已經完成時，我們收到了 Michael Burawoy 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們失去了一位傑出的學者、一位公共社會學的全球推動者、偉大熱心的全球對話創始人、一位了不起又慷慨的人。為了向他所代表的一切致敬，我們將在下一期雜誌中獻上對他的紀念。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發佈於 [官方網站](#)。

> 投稿請寄信至 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編輯團隊

主編：Breno Bringel.

助理編輯：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編輯：Christopher Evans.

執行編輯：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區域編輯團隊

阿拉伯世界：(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亞)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Shaikh Mohammad Kais, Abdur Rashid, Mohammed Jahirul Islam, Touhid Khan,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Rasel Hussain, Ruma Parvin, Yasmin Sultana, Md. Shahidul Islam, Sadia Binta Zaman, Farheen Akter Bhuiyan, Arifur Rahaman, Ekramul Kabir Rana, Saleh Al Mamun, Alamgir Kabir, Suraiya Akter, Taslima Nasrin, Mohammad Nasim, S. Md. Shahin.

巴西：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Carine Passos.

法國／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蘭：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Sebastian Sosnowski.

羅馬尼亞：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Elena Mihăilă.

俄羅斯：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灣：李宛儒, 周芸瑄, 郭智豪, 簡芊楹, 黃翊碩, 賴奕璋, 林韻柔, 呂道詠, 李妮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社會學對話」的部分，Volodymyr Shelukhin 與 Joan Martínez-Alier 談論了 Serhii Podolynsky 以及社會理論中的生態轉向。



在主題專欄「摩洛哥社會學和 ISA 論壇」中，涵蓋了殖民地和外國社會學流派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摩洛哥社會學流派」的出現等主題。



在「理論觀點」部分，文本中試圖回答如何研究政治兩極分化的問題，並以拉丁美洲現實的實證研究為基礎。

封面來源：Martin Vorel，維基百科



Global Dialogue 由SAGE贊助

> 目錄

編輯的話	2	公民科學與新型的權利議程	26
		Sarita Albagli, 巴西	
> 社會學對話		重新思考開放科學：邁向公平與包容的關懷	29
Podolynsky 與社會理論的生態轉向：		Ismael Ràfols, 荷蘭／西班牙	
專訪 Joan Martínez-Alier	5		
Volodymyr Shelukhin, 烏克蘭		> 理論觀點	
		極化與政治的衝突：來自拉丁美洲的洞察	32
> 摩洛哥社會學與2025年 ISA 論壇		Gabriel Kessler 與 Gabriel Vommaro, 阿根廷	
摩洛哥的社會學制度化			
Adbelfattah Ezzine, 摩洛哥	8	> 議題開講	
重新審視摩洛哥的當代社會學		海地：國家的暮色	35
Abdellatif Kidai 與 Driss El Ghazouani, 摩洛哥	12	Jean-Marie Théodat, 海地／法國	
摩洛哥社會學以及一般社會學		繪製衝突：形構美洲「綠色」開採的相關爭議	38
Kawtar Lebdaoui, 摩洛哥	16	Mariana Walter, 西班牙、Yannick Deniau, 墨西哥 與 Viviana Herrera Vargas, 加拿大	
		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簡要圖解	42
> 開放科學		Miguel Serna, 烏拉圭	
開放與包容的爭議領域		在危機和不確定時代中的拉丁美洲與哥倫比亞社會學	45
Fernanda Beigel, 阿根廷	18	ALAS (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	
開放科學的辯證：			
在 UNESCO 針對開放科學提出建議的三年後			
Eunjung Shin 與 Jae-Mahn Shim, 南韓	21		
非商業化的科學：是否只能是烏托邦式的想像？			
Ana María Cetto, 墨西哥	23		

「需要重新思考開放科學的概念化和推廣，
以實現提供認知正義的目標。」

Ismael Ràfols

> Podolynsky

與社會理論的生態轉向： 專訪 Joan Martínez-Alier



Joan Martínez-Alier, 2009。出處：維基百科

Serhii Podolynsky (1850-91) 是十九世紀最具創造力的烏克蘭社會學家之一。他的影響力深遠，卻尚未被充分研究。他究竟是個推動革命的人、學識淵博的研究者，還是一個瘋子？Drahomanov曾與Podolynsky 合作，卻和這位情感豐富的無政府主義者保持著距離；[Mykhailo Hrushevsky](#) 和 [Mykyta Shapoval](#)更將他列為烏克蘭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思想在烏克蘭科學院第一任院長Volodymyr Vernadsky 的推廣下發揚、啟發了許多作家，著名的加泰羅尼亞社會學家 **Joan Martínez-Alier** ——生態經濟學和政治生態學的創始人之一、奠定了所謂巴塞

隆納學派基礎——即受他影響。Martínez-Alier 教授曾獲頒歐洲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界最負盛名的 Balzan 獎，以及被比擬為社會科學諾貝爾獎的 Holberg 獎。在接受這兩個獎項時發表的兩次演講中，Martínez-Alier 都提到了 Serhii Podolynsky。

Martínez-Alier教授本來打算發表一份以Serhii Podolynsky為主題的報告，但由於一些原因未能成功。於是，我們最後改為在本刊中，收錄了這場由烏克蘭基輔大學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學系的Volodymyr Shelukhin 進行的訪談。由烏克蘭社會學學刊與基輔塔拉斯謝甫琴科國立大學（Serhii Podolynsky 的母校）之社會學系共同舉辦的「[Potential Classics: Superseded, Forgotten, and Uncovered in the History of Ukrainian Sociology](#)」研討會（2024年6月5-6日），是這場訪談的重要脈絡。這個研討會中聚集了來自烏克蘭國內外的學者，是烏克蘭首次以烏克蘭社會學史為主題的會議。

Volodymyr Shelukhin (VS)：您對 Serhii Podolynsky 的認識是從 [Volodymyr Vernadsky](#) 的書開始的，但這本書是如何引起您的注意的呢？以一位社會學者來說，閱讀一本主題是地球化學的書，好像是有點出人意料。

Joan Martínez-Alier (JMA)：1979到1982年間，我和西班牙生態經濟學家 José Manuel Naredo 一起出版了一本解釋 Podolynsky 農業能源學的書，這本書以西班牙文、加泰隆尼亞文出版，也在《農民研究期刊》上以英文出版。在書裡面，我做了一個總結 Podolynsky 文章中數字（以千卡為輸入和輸出）的表格。1986年，我準備撰寫《生態經濟學》（1987）一書時，閱讀了 Vernadsky 的《La Géochimie》（1924）。這本書是我的朋友 Jacques Grinevald 推薦給我的，他是一位法國哲學家、認識論家、生態學家、科學史學家。除了這本書，他也和我分享了 Vernadsky 討論能量和熵的作品，以及他為 Podolynsky 撰寫的半頁悼詞。

VS：在研究 Podolynsky 以及 Vernadsky 的作品時，您的資料來源是什麼？1970年代時，Podolynsky 基本上被大家遺忘了。他最重要的一篇文章，甚至是到了2004年才以英文發表。

JMA：Podolynsky 在1880年發表了一篇關於農業能源學的文章，有義大利文、德文版本，這些我能讀懂；另外，也有烏克蘭文，以及以俄文發布在《Slovo》上的版本，這些要有人幫忙我才讀得懂。它被翻譯成英文，已經是很久之後的事了。總之，這一篇文章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VS：當您開始研究 Podolynsky 的相關遺緒時，您就已經知道 Roman Serbyn 曾經針對這個主題進行研究了嗎？

JMA：是的，我知道 [Roman Serbyn](#) 有這樣的研究。我們多年前就有聯絡過。當然，Podolynsky 寫的是烏克蘭經濟史：他屬於一個反沙俄的烏克蘭知識份子團體。在俄國，他和 Piotr Lavrov 關係緊密，Lavrov 是「Narodnik」（一種支持農民、反對沙皇主義的政治傾向）。Podolynsky 也曾和馬克思有過短暫的會面。1880年，他流亡到蒙彼利埃，也曾在 Breslau (Wrocław) 和蘇黎世學醫。他最後因為病情而英年早逝，實在令人惋惜。他跟 Narodnaya Volya 團體關係不錯，但我會說，他確實是一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基輔和利沃夫的烏克蘭大學，名字中都有 [Mykhailo Drahomanov](#) 和 [Ivan Franko](#)——兩人都是 Podolynsky 的朋友，也是他的靈感來源。

VS：某種意義上，Serhii Podolynsky 可以說是十九世紀中較不尋常的一位思想家。在工業化、鐵路和蒸汽機的時代，他對自然和農業關係的關注，似乎顯得有些過時。

JMA：Podolynsky 曾接受過優秀的科學教育，這是他能夠寫出農業能源學文章的原因。他對於能源方面的研究特選應去，也在作品中引用 [Moleschott](#) 和 [Clausius](#) 的說法。因此，他可以計算出太陽光在光合作

用中轉化的能量，以及人類和動物的勞動應用在農業時，這個能量會如何增加。在他看來，能量的盈餘是增加的，他在1880年用德文寫給馬克思的《Mehrarbeit》中提到了此點。然而，有大量的能量，是由自然產生的，並不需要人類的勞動來生產（物理意義上的生產，以千卡計量）。這樣的觀點，在1880年時還是相當創新的。Podolynsky 的文章在歐洲以多種語言發表，也曾刊登於馬克思主義期刊《Die Neue Zeit》上，不過馬克思主義者們對此不太感興趣。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並沒有寫過涉及農業能源學的文章。後來，一些生態學家，比如1970年代的 David Pimentel 和 Howard T. Odum 開始研究人類經濟的生態能量學，以及農業的 EROI（進入田地的能量與作物的能量之間的比率）。他在作品中討論的事情，如今成為了生態經濟學的關注焦點。

VS：您針對 Podolynsky 的作品，以及其與馬克思主義觀點的關係進行了一些詮釋，一些正統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於您的詮釋提出質疑。他們的主要論點，是我們無法以社會科學的生態轉向來理解 Podolynsky，因為他只把自然視為資源的複合體——他對自然有一種消費主義的看法。您會如何回應這樣的批評？

JMA：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0-82年（馬克思在1883年初去世）曾讀過 Podolynsky 關於農業能量學的文章，他們認為文章中提到的事情，對於研究社會和經濟來說，並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恩格斯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表示他認為 Podolynsky 嘗試從物理的角度來分析經濟。這樣的說法是不對的。有些馬克思主義學者似乎認為，恩格斯是不可能出錯的，這點我不同意。

VS：當代經濟學、社會學及相關領域的哪些理論，可能與 Podolynsky 的觀點是類似的？

JMA：Podolynsky 超前於他的時代許多。他透過能量單位——每公頃千卡——的使用，根據農業生產／輸入的現實資料，開發了一個生物質生產模型。千卡不只與輸入（光合作用加上人類和動物的勞動，還有種子、肥料與現今的石油等）有關，也和輸出有關。成人每天攝取的熱量大約在1800到2500千卡之間。正如 Vernadsky 在1924年所寫：「Podolynsky 了解生命的能量學，並試圖將他的發現應用在經濟研究上。換句話說，他研究的是農業的社會新陳代謝，而他的模型可應用於整個經濟。他被公認為農業能源學的先驅，同時也是生態經濟學的先驅。能源研究和社會科學領域，以及能源研究和經濟、社會史領域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來說，和他的觀點是十分斷裂的（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他死得比較早，其二是恩格斯在1919年首次發表的和馬克思的通信中，對他的負面評論，促使馬克思主義學者雖然知道，卻並不欣賞他的著作）。不過，他並沒有完全被遺忘。1982年，我和 Naredo 在《農民研究期刊》發表的文章，以及我1987年出版的著作，讓新生代的生態經濟學家以及生態人類學家重新有機會認識他。Roy Rappaport 在1968年出版了一本書，內容是關於新幾內亞 Tsembaga Maring 族群的農業能量學，以及社會制度和宗教。我在1972年讀過這本書，當時我還沒讀過 Podolynsky 的文章，也不知道恩格斯有那樣的反應。事實上，甚至在1971年之後，Howard T. Odum 和 D. Pimentel 發表他

們有關能源與農業的文章和書籍之前，我就已經在課堂上教能源和農業關係了。

我的結論是，Podolynsky的取徑，對於不斷成長的環境社會科學，以及環境歷史領域都是非常有助的。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農業能量學」、「社會新陳代謝」、「生命能量學」、「熵定律」和「經濟過程」等名詞，對主流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說，仍然是極為陌生的。

VS：我同意，這些詞彙很少人知道，不過熵的概念倒是有許多受到協力學（synergetics）啟發的社會學者在使用。他們會不會對 Podolynsky 的思想有所知悉？

JMA：對於協力學我並不清楚。您可以閱讀 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的《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s Process》（1971）。他提到過 Podolynsky，但不是在這本書，而是他在1986年的文章「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in Retrospect」裡。

到了1986年，Georgescu-Roegen（1979年時，我曾在巴塞隆納見過他幾天）已經讀過我和 Naredo 一起研究 Podolynsky 的著作，也知道我1987出版了《生態經濟學》一書的初稿。他就是從這本書得知 Podolynsky 的。順便說一下，有關 Podolynsky 的農業能源學、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應，以及 Vernadsky 的接受程度等許多資訊，在我的著作《生態經濟學》（1987，新版則於1990年出版）中都有解釋。

VS：您目前的研究計畫，著重於全球各地的生態衝突。目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也很大程度地涉及了生態層面。雖然您尚未研究過烏克蘭的情況，但您能否就此為烏克蘭提供一些簡單的建議？我們該如何應對這些新的生態挑戰？是否有可能建立一個與自然和生態思維和諧共存的成長型經濟？

JMA：好的。透過由集體促成的全球環境正義地圖集（EJAtlas），我們嘗試呈現出許多地方正為環境正義奮鬥的現況。經濟成長有時意味著環境的破壞，例如污染。在這些運動中，人們有類似的敵人，像是大型採礦公司。我最近讀到了一個案例，是塞爾維亞投訴中國紫金公司，因為他們在博爾開採和冶煉銅礦——像這樣的衝突有數百個，而且大多時候，這些企業都是跨國公司。此外，最近塞爾維亞也有平民百姓針對 Rio Tinto 公司開採鋰元素的行為提出控訴。不管是在哪個國家，經濟成長都不該指向環境破壞。對於烏克蘭來說也是這樣的，至少在他們重新取回和平時是如此。■

來信寄至：
Volodymyr Shelukhin
<volodymyr.shelukhin1991@gmail.com>

> 摩洛哥的社會學制度化

Abdelfattah Ezzine，Espace Médiation 所長與創辦者、摩洛哥社會學研究所國際調解員，摩洛哥

出處：Magharebia，Openverse。



工業革命時期，社會學以社會工程學的形式誕生。當時，社會學的出現，是為了應對因工業革命而出現的、社會結構的不平衡和國家的功能失調。從那時起，社會學知識的主題圍繞著對於其觀察對象、方法論、研究方法的論辯和反思。它從最初的社會思想，逐漸演變為一門科學。它在英語世界——特別是在美國——被稱為「societology」；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地方，則將它稱為「社會學」（sociology）——這個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儘管這門科學在歐洲與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中，有著相似的制度化過程，然而，在全球南方國家（或非西方國家）——尤其是本文著重的摩洛哥——其興起與制度化卻經歷了極為不同的發展。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讓讀者了解摩洛哥社會學的發展軌跡，並且能夠更清楚——當其他社會學家指出自身是處於「知識的權力」而非「權力的知識」之下時，摩洛哥的社會學家所要接受的挑戰。

> 摩洛哥社會學的制度化：前保護國時期

事實上，地中海地區理性主義（Ibn Rushd/Averroes, 1126-1198）和社會思想（Ibn Khaldun, 1332-1406）發展的關鍵人物，都是來自摩洛哥。然而，社會學作為「社會科學」與科學知識被引入摩洛哥時，卻是為了佔領當地、破壞並重建其社會結構，而這個目標的名義，則是「文明化落後國家」。在阿爾赫西拉斯會議（Algeciras Conference）談判後，摩洛哥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在柏林會議（1884-1885）上，歐洲殖民國家圍桌而坐，商討如何瓜分非洲大陸。

在這段期間，法國一方面希望能夠正當化自身佔領摩洛哥的行為，另一方面則派遣間諜和協作者到摩洛哥收集資料，以了解當地情況和社會組成。他們的目的，是建立我所說的「統治理論」（theory of domination），這有助於「統治摩洛哥」和確立保護國的關係。這些行動在1904年成立的「摩洛哥科學使團」（Mission scientifique du Maroc）中達到巔峰，該使團出版了《摩洛哥檔案》（Archives marocaines），後來又出版了《穆斯林世界評論》（Revue du monde musulman）；1914年，就在摩洛哥被強行賦予保護國地位之後，在總駐軍的同意，以及與原住民事務部和情報處的合作之下，其更以《摩洛哥的城市和部落》（Villes et tribus du Maroc）為名第三次出版。

> 摩洛哥社會學的制度化：保護國時期

在這段時期，社會學及相關的社會與人文學科，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統治的限縮。因此，社會科學成為了服務佔領國（法國與西班牙）的知識，致力於正當化佔領國擁有文明、擁有將文明強加於保護國此一使命的論述。

在保護國時期（1912-56年），很少有非法國的研究人員被允許在「法屬摩洛哥」作研究，同時，西班牙則開放其他國籍的研究人員進出。此外，生產社會學和社會知識的人，大多是保護國政權的行政人員（文官、武官、高級行政官員），只有極少數摩洛哥人被保留為線人或輔助人員。

綜觀這段時期的學術作品，可以發現社會學在摩洛哥的實踐，是一種滲透與臣服的工具，其目標主要是收集資訊與情報，以了解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與資源。然而，在不同領域的實踐上，也有著某些細微的差異；因此，我在以下各節採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

> 「法屬摩洛哥」的社會學

當時的法國社會學主張涂爾幹主義。與此同時，法國社會學以二分法為基礎，構建了一套理解摩洛哥現實的方式，試圖培養摩洛哥社會當中的衝突與對立，以達成「分而治之」的目的。在此背景下生產的知識，不僅運用於27年的和平時期，在其獨立之後也同樣存在。

這種二元對立的觀點，形塑了一些單一的實體，所謂的「學術」文獻如同下列表格所示。

這些概念被納入了行政實體的運作當中；表格第一列的區域被認為適合文官控制，第二列中的區域則由軍事人員管理。從政治領土的角度來看，文官區域是「有用的摩洛哥」，而其他區域只是「無用的摩洛哥」。

法屬摩洛哥的社會學賦予了法國特權，將其視為「殖民」這項國際使命的先鋒。總駐軍的權力並沒有取代蘇丹的權力，而是疊加在蘇丹的權力之上，並透過維齊爾（舊時穆斯林國家的重要官員，尤指為統治者提供建議的官員）的制度規避。方法上來說，這種社會學只是嘗試採用了當時盛行的取徑和資料收集技巧。主要的問題，在於分析與詮釋——資料的蒐集與詮釋，大多以原住民社會為參考，顯示出民族中心主義不僅融入了概念的發展和方法，且作用於田野工作與研究結論中。

> 摩洛哥的西班牙社會學

在其影響的地區內，西班牙的行為與法國大致相同。它以所謂的科學使命作為正當化自身殖民的依據，並仰賴無線人提供的資訊。其基本理念是將當地的社會政治和領土，與被剝奪的摩洛哥領土——休達、梅利利亞、撒哈拉——做出區分。

西班牙社會學知識，以「Africanismo」的概念——摩洛哥與西班牙之間的社會歷史「創傷」（Al-Andalus、安瓦爾戰役，尤其是內戰）——為核心。這個概念也成為以各種形式，形塑了壓迫摩洛哥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在此情況下，兩國之間的歷史，使西班牙受到文明使命的阻礙，難以對摩洛哥施行「志願客觀主義」（voluntarist objectivism）。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西班牙及類似的社會學著作中的「主要功利主義」（primary utilitarianism）並不是一種專業的研究領域，而是一項結合了宗教人文主義的使命。

> 其他國家在摩洛哥的社會學實踐

很少有其他國家的社會學家對摩洛哥感興趣，或者說，很少有社會學家獲准在摩洛哥進行實地研究，尤其是在1912年之後。大多數人都以當時已成為國際區的丹吉爾為基地。

芬蘭人 Edvard Westermarck 從1898年到1939年一直待在摩洛哥。他的旅行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與朋友 Sidi Abdeslam El Bakali（Jbala 地區治安官）的關係。在他的每一趟旅行中，Sidi Abdeslam El Bakali 都為他提供保護。在1817年出版《Tribes of the Rif》（1966年再版）的 Carleton Coon 也提到，Westermarck 對西班牙人的好客、體諒和高度合作，以及他所研究的社會表示認同。

我選擇這些不同背景的外國人，來呈現摩洛哥多元、多種族的社會學，是為了顯示西方中心視野的特殊性。這意味著，人類學（甚至民族學）被視為「外來的社會學」，而社會學則被視為「內部的人類學」。

> 摩洛哥獨立後的社會學

自摩洛哥獨立以來，社會學以一種極為矛盾的形式被研究者採用。一方面，受其啟蒙的菁英階層，認為社會學是現代化的關鍵，其打破了馬士禮格的文化傳統、目的在於了解並更好地診斷社會的弊病並克服它們，邁向更美好的社會。另一方面，當權者則將其視為不方便的科學。

對立		觀察
阿拉伯	巴巴里	巴巴里人如今被稱為 Amazigh，於2011年的摩洛哥憲法中得到承認。
<i>Chraâ</i> 穆斯林司法	習慣法	習慣法是穆斯林司法的變體。摩洛哥猶太人為被提及，猶太人曾是 <i>dhimmis</i> （生活在伊斯蘭國家保護下的非穆斯林，享有特殊地位），根據現行憲法，猶太人已是正式公民。
<i>Bled Makhzen</i> 中央領土	<i>Bled Siba</i> 不服從中央的領土	在摩洛哥歷史中， <i>Siba</i> （異見、反抗或叛亂）與自命不凡（pretension）是不同的。 <i>Siba</i> 從不質疑蘇丹作為「信徒統領」的宗教地位，但反對他的政治權力。

雖然摩洛哥大學在1961年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下，推動了社會學系的成立，但該學會在1970年，因多年前的事件所引發的後果而不幸解散。研究所關閉後，社會學併入哲學與心理學系，並改為從研究生階段，才有社會學的主修。與此同時，社會學的博士學位課程，也與其他人文科學一樣歷經了阿拉伯化。

為了對抗批判性思維的興起及其左翼政治色彩，社會學系被伊斯蘭研究系取代。當時，在摩洛哥各地興起的11個藝術與人文學院中，都出現了伊斯蘭研究系。

> 殖民遺緒

儘管社會學的過去多舛，但它仍無疑是摩洛哥的遺緒之一。摩洛哥的研究人員透過「雙重批判」（A. Khatibi），重新使社會學得以為之所用。他們處理了那些支持宰制理論的錯誤論述，也調整了那些用來收集資料的方法與技術、更反思了這些資料過去如何被不當用於構建出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的結論。這場行動不僅聚焦於摩洛哥的研究，也深入到社會科學的基本認識論與認知領域。

在此情境下，有些人批判種族隔離（P. Pascon、A. Taoufik、A. Hamoudi 等）、其他分析模型也迎來各自盛行的時期。殖民生產，而非殖民主義生產，也成為摩洛哥研究者的聚焦主題之一。由於摩洛哥的法語化政策，針對西班牙社會學的分析稍嫌不足，針對法國學派的討論更為熱烈。

> 盎格魯撒克遜社會學的出現

隨著國家獨立，盎格魯撒克遜社會學進入了摩洛哥。基於地緣策略取向，人們開始對摩洛哥感興趣。在美國，有關摩洛哥的研究尤其豐富——那些希望能以阿拉伯世界、伊斯蘭教、文化多樣性等主題作為研究領域的人，將摩洛哥當成了做研究的沉浸式實驗室（Clifford Geertz 及其學生是案例之一）。

作為先驅，傑出的盎格魯撒克遜學者培養了學生，而這些學生如今成為教師，又相繼被他們的學生所取代，一套摩洛哥人因語言、傳播及審查制度侷限而難以觸及的知識體系也於此形成。直到最近，英語的語言與文學專業畢業生，才開始透過翻譯、評論來普及這些作品，在藝術與人文學院的其他語言文學系中也是如此。法語語言文學系除外，它一開始就沒有被排除在外。得益於各系之間，甚至各大學之間搭建的橋梁，社會學變得更加豐富、成為了其他專業的基礎課程。

如今，摩洛哥對各種外來的學術抱持著開放的態度，自20世紀80年代末社會學得以重建以來，各藝術與人文學院紛紛設立了新的社會學系。在此之前，社會學僅在拉巴特和非斯的藝術與人文學院開設。更重要的是，當時學習社會學被視為一種左翼傾向。

> 摩洛哥社會學學派的出現：障礙與資產

我利用上述歷史上的里程碑，簡易地勾勒出了「摩洛哥社會學派」出現的背景。這個學派是多語的，並以阿拉伯語和法語為核心。隨著摩洛哥的研究人員在尋求培訓和就業方面，有了新的視野，英語和西班牙語的社會學寫作，也逐漸有了進展。

摩洛哥社會學學派的制度化，受到了上述社會政治條件的阻礙，也受到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研究管理不善的影響。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大多數專業——尤其是社會學——一直是被區域化管理的。由於這些專業的管理不善與使用效率不佳，其經濟資源極為缺乏。此外，一些針對社會和人類研究的公共資助計劃，幾乎沒有真的協助到社會學的發展，私人資金也未能跟上發展的步伐，而培訓、專業知識、諮詢與研究活動等面向中，應遵循的道德義務和法律規範也缺乏明確的指導和規範。即使是某些部門間在特定領域的合作關係，也是如此。

幾位社會科學研究者通過大學內外的協會組成了興趣小組，並藉此回應了社會對培訓、諮詢和專業知識的需求。學生們認為，小組為他們提供了獲得教授專業指導，以提升自身技能的理想機會。這樣的案例有許多，包括社會科學研究與學習中心（[CERSS](#)）、調解空間事務所（[espacemediation.org](#)）、以及區域移民、空間與社會觀察所等。

最新一波的大學改革，促成了若干實驗室的設立，但它們仍受到官僚結構、繁瑣的財務管理以及「學術人」心態的制約。儘管如此，這些實驗室提供的多元化活動仍然活化了大學生活，並為國內外的大學交流創造了可能。

為了彌補這些限制，個別研究者和研究團隊舉辦了一系列的旗艦活動。其中包括「全國社會學日」，這是一項由摩洛哥社會學研究所組織的年度巡迴活動；以及由阿爾阿卡瓦因大學與拉巴特的穆罕默德五世大學共同舉辦的「社會科學春季」。這些活動採取了類大學（para-university）甚至近大學（peri-university）的工作模式，不僅促進大學與其社會、經濟、民間乃至政治環境的交流，也為來自不同背景的各代研究者，以及年輕的碩士與博士研究生，提供了一個非正式的對話與學習空間。

> 展望與國際前景

由於其多語言的特性，摩洛哥的社會學在某種程度上得以避開阿拉伯化或伊斯蘭化等影響整個 MENA 地區（中東與北非）的趨勢。

自1990年代以來，摩洛哥的社會學界，與各類私人高等教育及培訓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促進了跨國的大學教育交流。這不僅加強了與英美學術成果的互動，也為社會學家及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提供了機會，使得新

興的摩洛哥學派蓬勃成長。學術與研究的國際化進程，促使許多摩洛哥社會學家有機會前往海灣國家的學術機構任職，無論是作為移民長期工作、短期訪問，或參與由這些國家資助的學術網絡。這些機會不僅拓展了摩洛哥社會學學派的影响力，亦使其與 MENA 地區的其他國家練力連結，開闢了超越傳統學術機構發展空間。

摩洛哥社會學研究所承襲了摩洛哥社會學網絡的學術遺緒，其重組了社會學實踐、推動每年「全國社會學日」的舉辦。在此背景之下，摩洛哥的社會學正逐步組織化，「摩洛哥社會學學派」也日益茁壯。藉由上述行動，摩洛哥社會學為社會學這個學科做出了貢獻，也讓國際間的對話得以立基於「知識的力量」，而非屈從於單一的「權力的知識」。

我們將於2025年7月6日至11日，在摩洛哥拉巴特舉辦第五屆 ISA 社會學論壇。讓我們在慶祝多元性的同時，堅守學術倫理、確保社會學及社會人文科學不被功利主義或其他權力形式所左右，並維護學術自由與獨立，確保研究者得到應有的肯認與尊重。■

來信寄至：
Abdelfattah Ezzine <abdelfattahezzine@hotmail.com>

> 重新審視摩洛哥 的當代社會學

Abdellatif Kidai 和 Driss El Ghazouani, Mohammed V University of Rabat, 摩洛哥



出處：Mino Andriani, 2023, iStock

在摩洛哥，社會學研究在其思想、方法與取徑上遇上了一些阻礙。首先，是研究人員對推動學科發展的興趣不足，以及社會學文獻稀少——比如說，摩洛哥缺乏較為完整的評論性文章、書評、主題性書籍、會議論文等等。其次，是後殖民獨立社會學的國族特性——「國族社會學」（national sociology）於形成的過程裡，正好遇上獨立初期國族化的教育學院，以及一些國族主義者與君主體制之間的政治抗爭，並深深受其影響。因此，在摩洛哥，要區分科學家、社會學理論家與政治家在社會學上的角色與行動，往往是一項挑戰。第三個障礙，涉及了何謂摩洛哥社會學／社會學家——在摩洛哥的學術界，當人們討論文化、知識分子、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相關話題時，社會學很少成為焦點。

本文旨在討論當代摩洛哥社會學，包括其不同主題、取徑、方法以及當前的挑戰。首先，我們將檢視這門學科在摩洛哥的發展，重整殖民時期前、中、後的社會學文獻。人們將殖民時期視為摩洛哥社會學發展的重要推手，不過，有新一批的社會學家，嘗試超越東方主義論述的限制，開展社會學的去殖民化。他們致力於建立社會經濟發展取向的國族社會學，試圖以社會學為後人貢獻。本文的第二個目標，是介紹摩洛哥社會學研究中的關鍵主題、較普遍的方法與取徑，以及它們在這個研究領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最後，我們將探討其中尚待處理的問題。

> 摩洛哥社會學的起源

我們可以由摩洛哥的社會學研究中，清楚地看見當地於後殖民時期的政治論辯。有相當比例的社會學家受到 Mohamed Guessous 的影響，他是社會主義政黨 Union socialiste des forces populaires 的成員。為了在學院中取得上位，他們制定了多項策略。社會學領域在1960與1970年代成為了政治競爭的戰場，由於拉巴特社會學學院一度成為大學生與學者批判思想的中心與象徵，當局因其批判與左派的色彩，於1970年將其關閉。

理論典範方面，1960和1970年代，是由馬克思理論佔據主導地位。當時的社會學試圖對於社會的運作進行全面地分析。Paul Pascon便採用了整體性的概念——包括社會形成、生產模式、複合社會、社會階級、社會現實層次——來研究「Haouz」社會，乃至整個摩洛哥社會。這種強調社會整體性的觀點，在其餘的社會學研究中也很常見。比如 Abdelkébir Khatibi 撰寫了一篇討論社會階級的文章，而 Abdellah Hammoudi 則運用了整合研究 (integrated study) 和整合發展等概念。然而，整體性取徑後續也逐漸受到質疑。

> 後二十世紀發展與都市轉向

Abdelrahman Rachik 指出，1990年代初期，摩洛哥社會學對女性、家庭、青年和社會化等主題的研究顯著增加，而這個現象與女性的價值觀、社會運動與各方面的人權論述差不多在同個時期出現。這段期間，相關領域的學術行動大幅成長，摩洛哥學者也在此行列中，例如 Fatima Mernisi、Aïcha Belarbi、Ghetha Al-Khayyat、Fatma Al-Zahra Azroel、Rabia al-Nasiri、Rahma Bourqia 和 Mohammed Talal。

Rachik 則指出，摩洛哥的都市相關研究，反映出摩洛哥社會學家當時還有另一關注焦點——都市社會學的主流題目，多與住房（棚戶區和貧民窟）、都市化、都市政策、房地產和交通有關。Françoise Buchanin、Mohammed Nasiri、Abdel Ghani Abu Hani、Mohammed Benatu、Abdelrahman Rachik、Abdullah Lahzam 及 Aziz al-Iraqi

的著作清楚地呈現出了這樣的背景。根據 Rachik 的說法，這些研究大多以法語執行。

> 著手處理當代議題

此外，以 Mokhtar al-Harras、Rahma Bourqia、Driss Bensaid、Ahmed Cherrak 和 Abderrahim al-Atri 為首的眾多社會科學家，則以文化社會學、價值社會學、農村社會學和家庭社會學為研究主題。過去二十年來，這些研究人員大多以阿拉伯語執行研究，他們對新一代摩洛哥社會學家的崛起有許多助益。

有關宗教、婦女、青年和移民等當代議題，則是另一批新生代摩洛哥社會學家的研究範圍，他們主要使用英語進行研究。關注集體認同、社會運動、性別關係與女性狀況、社會政治轉型、青年與移民的 Fadma Ait Mous，是這批學者中的佼佼者。研究貧窮的 Hicham Ait Mansour，也指出了摩洛哥學者對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接納程度較高。這表示，摩洛哥社會的研究，與全球社會有很大的關係，並能夠反映普遍的現象與變化。在摩洛哥的社會背景下以不同語言進行的社會學研究，根據其研究結果產生了许多理論、範例和方法，為社會學貢獻許多。

> 博士論文之限制

摩洛哥社會學中的博士論文，著重於十五個研究領域：家庭、組織、空間、融合與社會關係、不穩定性與貧窮、青年、教育、社會網絡、社會動能與變遷、工作、宗教、都市化、社會歷史、健康與鄉村社會。工作社會學、社會變遷、發展和文化是大多博士論文的重點。然而，這些論文並沒有透過引進新穎的方法或概念，對社會學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這使得摩洛哥的社會學領域持續地在方法論上有所缺失，阻礙了社會學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由於這些論文沒有發表，因此大多博士論文的研究結果，都沒有被整合到後續更廣泛的批判性討論當中。

> 長期研究計劃作為社會實踐

社會學與公部門有明顯的關聯，同時，人們也期望社會學家能協助分析摩洛哥社會的重大變遷。不過，一份研究以量化方法分析了1960年至2006年間出版的社會科學研究，指出社會學家在這方面的參與實為有限。造成這

>>

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經費有限、缺乏激勵研究人員的制度，以及缺乏專門的社會學期刊。由於缺乏推廣科學研究的公共政策，社會學的學術實務，基本上是以個人主動或個人網路為基礎，研究也是在大學機構以外的地方執行。目前對於發展議題（貧窮、邊緣化、社會排除、健康與環境）的研究，較長是為了回應政治與社會需求，而不是在長期研究計畫的目標底下執行。

社會學的主要挑戰，是在新的基礎上重建自身，為高等教育和科學生產提供新的動力。社會學的實務，不管是針對國內還是國外，都需要更精確地界定其研究方向。考量到即將進行的改革，如果趨勢是強化研究的理論架構，卻缺少了明確的研究對象定義，再多的架構可能都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我們應該促進社會學家之間的溝通、協調，確保資訊流通，對研究進行審慎評估，以規劃學科的科學未來。

> 阿拉伯化政策

另一項重大挑戰，則與摩洛哥的語言問題有關。目前，除了卡薩布蘭卡之外，所有社會學系都以阿拉伯語教授社會學。社會學的阿拉伯化過程，可追溯至 1970 年代早期，這反映出更廣泛的政治觀點，對所有社會科學學科都有其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由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社會文化層面，來理解人類科學的阿拉伯化。20世紀80年代，阿拉伯社會學家之間的爭論，圍繞著其社會的特殊性問題，呈現出兩極化的情況。在這場辯論中，那些認為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學應該為「普世」科學做出貢獻的人，與那些認為人類和社會科學不能要求普世性的人互相對立。在此脈絡下，在馬格里布地區——尤其是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阿拉伯語社會學家和法語社會學家之間出現了分裂，他們追求不同的研究議程，並研究著截然不同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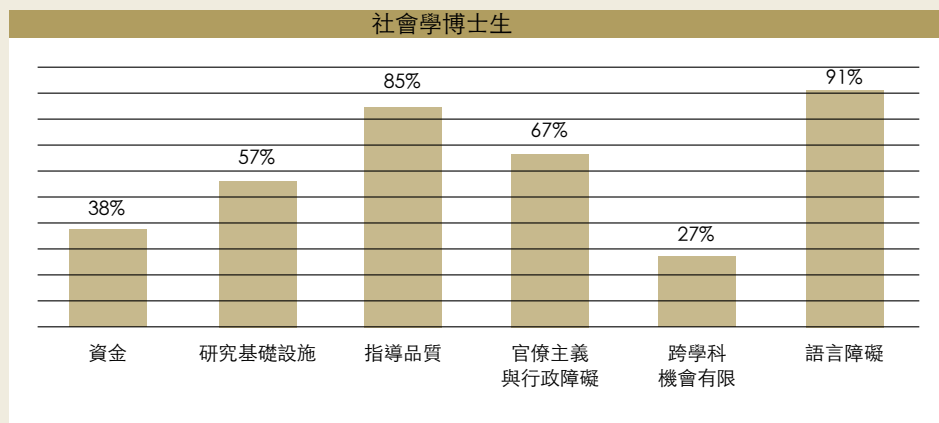
第一代摩洛哥社會學家在西方社會學傳統中接受訓練，受到歐洲的科學典範影響，並熱衷於參與國際社會的理論與方法論辯。然而，必須承認的是，年輕人的處境令人擔憂。摩洛哥的阿拉伯化政策，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正如馬格里布語言研究領域的專家所言，這樣的失敗可能是因為，阿拉伯化最初的目的，是為了讓馬格里布的兒童能精通其文化的語言，即古典阿拉伯語，同時掌握一門外語的能力。然而，大多數人並未能達成這兩個目標。

由於語言政策的缺失，很遺憾地，這些年輕一代的人，與他們所處在的學科內部累積至今的知識，以及法語摩洛哥人能夠輕易觸及的跨國科學領域，完全被隔絕開了。與此同時，他們的視野，正聚焦於重新檢視那些不屬傳統，卻又在某種程度上與社會科學主流趨勢脫節的方法論。新一代摩洛哥人與社會學知識來源之間的斷裂，可能會為摩洛哥社會學實踐的未來造成挑戰，並阻礙其融入國際社會的科學辯論。

> 社會學博士生面臨挑戰

摩洛哥的社會學研究涉及人類行為、社會與文化等廣泛領域。然而，由於多數專相關學者傾向政治左派，在摩洛哥的社會學教育所經歷的許多發展中，政治也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與許多國家一樣，摩洛哥大學的社會學博士生，正面臨幾項可能影響其學術與研究進度的挑戰（見圖一）。

我們的調查顯示，社會學博士生在受訓期間面臨許多挑戰。語言障礙被視為最重要的挑戰之一 (91%)，其次是指導品質 (85%)、官僚主義與行政障礙 (67%)、研究基礎設施 (57%)、資金 (38%)，最後是跨學科機會有限 (27%)。



| 圖一

語言障礙與導師品質，是摩洛哥或其他國家的博士生都可能面臨的重大挑戰。在摩洛哥，博士課程通常以法語或阿拉伯語進行。對許多學生——尤其是那些過去不曾以這些語言學習，或是這些語言的能力有限的學生——來說，他們理解上課教材、撰寫論文，以及與同儕和上司溝通的能力都會遇上困難。

以小眾領域的主題進行的學生，可能在尋找導師上會面臨困境。博士生接收到的督導品質可能差異很大：有些學生會獲得優秀的指導，有些學生則面臨缺乏即時回饋、與督導互動有限，或研究興趣不一致等問題，這些都可能影響研究的進度與品質。

在摩洛哥的大學裡，人們對社會學博士生的觀感，會隨著各種因素而異，包括師資、課程、教學經驗的品質，以及提供的就業能力（見圖二）。

我們的調查資料顯示，社會學學生對博士班的報讀有負面的看法。約有55%的人認為課程內容薄弱，而約有45%的人認為就業能力和職業前景不佳。此外，近40%的人認為老師「非常缺乏」教學經驗、43%的人認為「缺乏」。另一方面，35%的受訪者認為師資素質相對較好，25%則認為較弱。

總體而言，儘管國家當局在這方面做出了許多努力，但大多數學生對社會學博士的訓練仍感到不滿。期望接下來，新的論文制度改革，能以符合學生與大學整體利益的方式，來改善這些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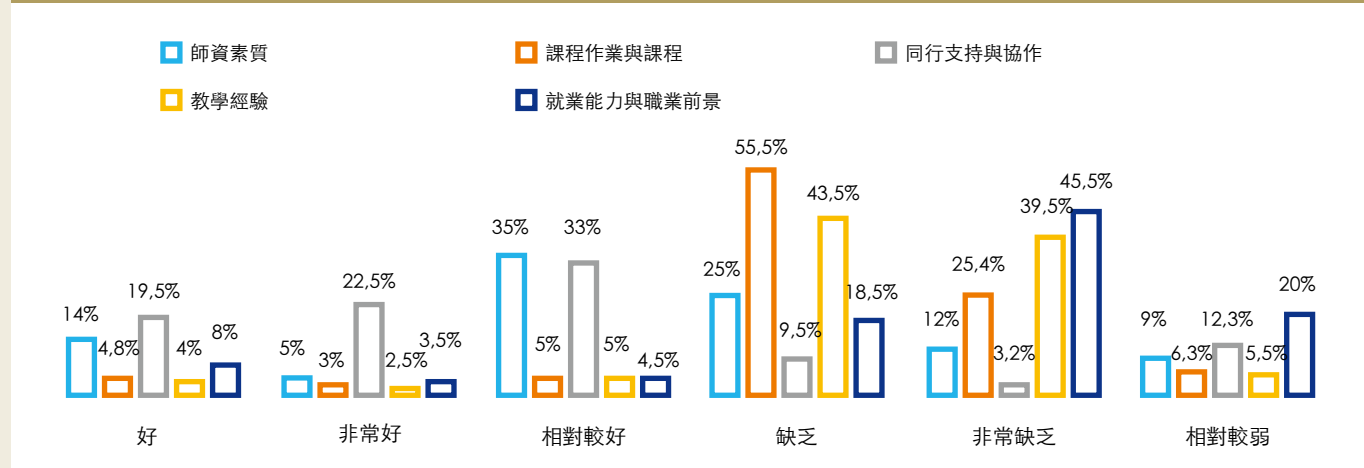
> 最後

如前所述，摩洛哥社會學經歷過重大的轉變，也面臨許多挑戰。在使用阿拉伯文的社會學家與使用法文的社會學家之間，存在著語言隔閡，導致研究領域充滿爭議。新一代的社會學家正在崛起，他們樂於接受英語的使用，並試圖超越主題與興趣之間的二分。

來信寄至：

Abdellatif Kidai <abdkidai@gmail.com>

對社會學博士生的觀感



圖二

> 摩洛哥社會學 以及一般社會學

Kawtar Lebdaoui，摩洛哥西迪·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大學



出處：Suzy Hazelwood，2017，Pexels

後殖民時代的摩洛哥面臨的挑戰之一是社會學的去殖民化，以及如何擺脫種族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本文的目的在於回溯摩洛哥社會學相對於殖民時期與一般社會學的特性，並質疑摩洛哥社會學去西方化的挑戰。

盤點摩洛哥社會學史上朝向建構社會學自我的決定性轉折點，使我們能夠分析摩洛哥社會學與一般社會學演進之間的結合與分裂動態。

> 摩洛哥社會學的反思與非殖民化

社會學和人類學在西方世界的興起是殖民主義運動的關鍵，為他們提供了控制原住民反抗的政治策略。科學知識是一種非軍事力量；它的成本較低，並能確保對被殖民者的更大控制。因此，雖然社會學以改變世界為目標，但也受到潛在的意識形態張力所引導。

在歷史與政治上，摩洛哥與殖民主義密切相關，沿著三個區分的時期：殖民前的摩洛哥、1912年後殖民的摩洛哥，以及1956年獨立後的摩洛哥。正因如此，將摩洛哥獨立前的社會學定性為意識形態與殖民主義，在認識論上需要非常謹慎，也讓我們能夠去描述摩洛哥社會作為去殖民實體，其社會學認同的出現。

有關摩洛哥的殖民社會學文獻非常廣泛。官方以專書和深入的田野調查，做出了寶貴的貢獻。該研究由「科學使命」（Mission scientifique）、「國民事務社會學科」（Section sociologique des Affaires indigènes）及後來的「摩洛哥高等研究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Marocaines）制度化，為後世的社會學家製作了「參考」文獻，而後世的社會學家確實以

認識論批判的方式回應該文獻，目的是創造一個從殖民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的民族社會學。

為了擺脫殖民歷史的纏繞，社會學轉向於實證與方法論的改進。[Paul Pascon](#) 這位社會學界的代表人物就是證明。為了了解並改變社會，他選擇了行動研究，展現出概念上的創造力，讓摩洛哥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分離，在 1970 年代產生深遠的回響。Pascon 藉由「複合社會」的概念，證明了幾種生產模式（部落主義、資本主義等）如何共存，而彼此之間的分界線卻不一定是明確的。

新興的社會學是由公共行動和國際組織的資助所界定的。因此，它通常以農村和婦女研究為主。雖然創始人選擇了以鑲嵌在馬克思主義的整體觀點，但後來的研究人員則傾向於更多以產業為基礎的研究。

去殖民社會學的先驅，建立了一條擺脫殖民主義知識及其意識形態的路線。在尋找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我們面臨的挑戰是重新思考「社會的我們」（nous social），並重建有關摩洛哥社會的知識基礎。

> 對「社會的我們」的科學挪用

摩洛哥獨立時期社會學創始者的使命是為了勞工階級的利益而促進世界的變革。他們主張與殖民主義有所區隔的社會學，在政治上代表被剝削者。

當民族社會學關注社會需求時，人類學則始終追求於理解社會。獨立後的人類學文獻一直致力於修正其殖民時期的對應文獻。它開始進入宗教與政治研究的新領域，並且以科學化的方式取得「社會的我們」。

批判性檢驗與去殖民化並不意味著抹去殖民文獻的遺產。儘管以歐洲為中心，但那些文獻提供了關於人民、社會關係、部落動力、政治權力等寶貴的經驗檔案。

在摩洛哥人類學科學建構的另一層面上，意識到西方（也是殖民主義的）人類學家與在地人類學家之間的認知差距，並不表示後者一定更熟悉摩洛哥文化。

當然，兩者的陌生感並不相同。就西方或殖民主義人類學家而言，由於對殖民意識形態的執著，以及將被殖民者想像成「野蠻人」、「原始」、「未開發」等，因此這樣差距是在本體論上的。相反地，對於當地研究者而言，差距是認識論上的，是因為他們渴求製造對社會變革有效的在地科學知識。

為了擺脫虛偽和直接證據，當地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採用 Alfred Schütz 的「[熟悉的陌生人](#)」概念。這種關於在地人類學家與殖民主義人類學家與其研究對象間，其社區關係的反思性，將產生一種相對於殖民文獻的，實證認識論上的他者性。因此，只要重新建構摩洛哥社會的科學社會學，繼續探討殖民與去殖民之間的這種辯證關係，這兩種文獻之間的邊界仍然是脆弱的。

> 對於具有去西方化觀點的社會學而言

儘管民族社會學在認識論上與殖民思想斷裂，但仍然對殖民思想保持積極的他者態度，與一般社會學並無衝突。與後者相同，摩洛哥社會學始終是一門關於社會的法則科學，能夠歸納不同的概念並建立有關社會生活的規律。但在何種意義上，它只能透過製造去西方化的知識而獲得解放？

從殖民到去殖民的轉變過程中，受到有利於公民的「改變世界」的社會學典範和「從內部看」的人類學典範的幫助。摩洛哥社會學創造了「由我們自己構想的社會本質」，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學解放，沒有方法論與理論的創新，也沒有深刻的本體論及認識論的反思，是無法實現的。

然而，知識去西方化的認識性的論述質疑在地社會學與一般社會學之間的關係，因為一般社會學是西方的，代表全球對在地的霸權。

事實上，去西方化的挑戰意味著摩洛哥的社會學，如同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社會學，必須採取去西方、反霸權的觀點。去西方化的社會學意謂著不僅是不再被殖民，也不再被支配與低人一等。

社會的多樣性只能導致新的、可信賴的在地知識的出現，以替代占宰制地位的，各式各樣的「全球化」。只要摩洛哥的經驗土壤是肥沃的，建構能夠描述其歷史、政治與社會文化特殊性的在地社會學，就能幫助它擺脫異化，並產生與西方霸權相抗衡的在地認知空間。這並不意味著孤立，而是在「在地」與「全球」之間闡述一種相互理解，並建立一種能夠為這兩種尺度之間的新關係注入活力的社會學。

總而言之，社會學的誕生不僅可追溯至其創始人與早期創始者；社會學不斷再生與重塑，使其符合社會的演進，也符合相關的認識論命題，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命題。因此，摩洛哥社會學需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將概念與理論去地域化、挪用典範，並建立能夠為全球與跨文明的創造性知識積累做出貢獻的跨國社會學基礎。■

來信寄至：
Kawtar Lebdaoui <kawtar.lebdaoui@gmail.com>

> 開放與包容的爭議領域

Fernanda Beigel，國家科學研究技術委員會和知識流通研究中心，阿根廷國立庫約大學



出處：Jacek Kita，2018，iStock

在 2020 年和 2021 年間，我有幸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諮詢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負責擬訂《開放科學建議》草案項目，並於 2021 年 11 月在第 41 屆教科文組織大會上獲得批准。在與代表世界不同地區的 30 位委員會成員專家的討論中，我們很快就發現了在世界經濟、技術、學術和社會不平等的背景下，開放理念的複雜性。由於數位基礎建設的不對稱發展，從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科學開放所面臨的挑戰都有顯著的變化，而且從西方到東方，在每個地區內，甚至在一個國家內及其內部結構的異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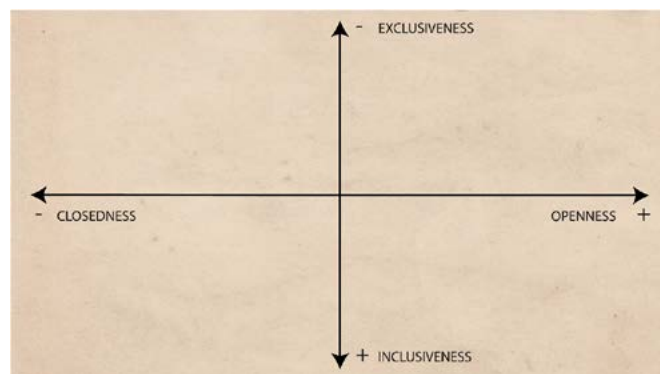
在制定《建議書》時，開放科學最發達的面向是科學出版物的開放取用。COVID-19 大流行似乎提高了公眾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正如一些研究報告所指出的，考慮到自布達佩斯開放取用計畫 (BOAI) 以來的 20 年平衡，開放取用誕生於一個崇高的願望，但演變為一個有缺陷的現實。學術出版界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備受推崇的期刊（如影響係數在 10 到 20 以上）的出版商，有很大的誘因將其資金轉換為混合模式，因為他們的訂閱量（雖然成本高昂）仍然源源不絕，而他們的投稿量也持續快速增長，遠遠超過其出版能力。在開放取用中誕生的學術期刊或要求支付越來越高的文章處理費 (APC) 的超大型期刊的動態漂移，為開放取用運動的成就蒙上了陰影。

在此背景下，所有共同參與這場內容豐富的學術辯論的專家所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在促進多樣性與跨文化性的同時，擴大科學的開放性。我將介紹我最近在柏林科學技術創新 (STI) 會議上提出的概念性討論，作為我所做的一系列對應的框架，以校正我們朝向包容性、開放性科學的進展有多少，或者排他性是否正在贏得遊戲。

> 包容性開放與排他性封閉之間的張力

在全球範圍內，開放科學有不同的發展路徑，它們之間相互衝突地共存著，而它們之間的張力不僅取決於開放性／封閉性的程度，也與包容性／排他性的兩極有關。圖一顯示了這個衝突空間中的不同組合，這些組合的組織方式類似 Bourdieu 描述特定場域特性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到右邊是開放性的特徵；而左邊則是封閉性的特徵。然而，結合縱軸，並從軸線相互交叉的中心點進行更實際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四個象限。上方象限的特點是排他性，由商業參與者或全球學術體系的傳統不對稱所驅動。相反地，在較低的象限中，則流通著高度的包容性，但由於主權問題或從屬群體所需的保護，開放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開放與包容象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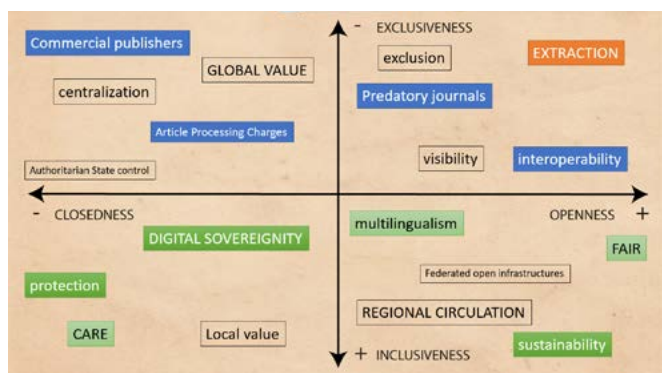


圖一

>>

以象限來分析，這個空間是依據相反的兩極來組織的；第一，以 Scopus-Clarivate 出版平台所組成的星座中佔主導地位的大型商業出版商為首的排他－封閉為特色。學術服務的集中度日益提高，而且學術界的公信力仍由這些出版商所控制，使得這個領域在全球研究評估的價值上佔有主導地位。因此，這些全球資料庫的結構性偏見加深了對高影響力期刊以外、以非英語語言發表的大部份科學成果的排斥，並將生物多樣性推向一旁。與包容性相反，這些商業出版商需要提供獨家的商品與服務，以確保能獲得全球卓越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定義上）是稀少且特殊的。右上象限是根據開放性的主要條件來組織的，例如協同工作能力和其他FAIR原則（可尋找性、可獲取性和可重複使用性）。但這會在「黃金」商業模式的框架內導致嚴重的排除，在此模式下，開放取用期刊將出版成本轉嫁給隸屬於無法負擔「閱讀與出版」協議的機構的個人作者。

開放與包容的領域



圖二

在圖一和圖二的右下象限，包容性開放與排他性封閉是對立的。開放存取這條道路的主要驅動力是區域出版平台和入口網站，例如 Latindex、SciELO、Redalyc、Biblat 和 AJOL，這些平台和入口網站為多語言的優質期刊創造了條件。鑑於學術界既有的階級體系對這些期刊價值不高，包容性開放科學可能較不顯眼，並以地區性流通為特色。然而，它體現了維護跨文化性、促進人類科學權利的重要努力。

在左下象限，我們看到的是包容的封閉性：這一極點的特徵是知識的流通受到限制，而這些知識大多受到當地重視。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科學成果在非索引期刊上傳播，許多沒有永久識別碼的科學資訊管理措施和數位平台，以及許多其他類似的經驗。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放科學諮詢委員會舉行的討論中，討論了開放的風險，涉及保護從屬社區、原住民知識或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容易被提取的科學資訊的必要性：開放所有可能的，只關閉必要的，這是辯論的基礎。然而，這不僅對於保護原住民群體對其在地知識進行自治管理的權利至關重要，而且對於尊重原住民群體的權利也至關重要。CARE 原則正是在這種緊張局勢下誕生的，如今已成為向包容性開放過渡的主要指導方針之一：集體利益、控制權、責任和道德。

封閉性可能是出於保護從屬群體或是提取潛在科學資訊的需要，且能夠被國家政府用來捍衛數位主權。從民主角度來看，政府可能需要保護資訊經濟中，公民的個人資料和企業的經濟利益。相反，在專制政體下，這個概念被用來限制學術自由和對公民施加社會控制。

我們可以看到，發展包容性開放科學的緊張關係不僅圍繞著國家開放科學政策、不平等的物質資源或商業利益。數據治理在涉及數位平台整合的爭議全球計畫中發揮關鍵作用。關於集中開放性基礎建設的優點和缺點存在著深入的爭論，而聯邦基礎建設的概念似乎出現了一條更具包容性和民主性的路線。

> 包容性和排他性動態中的利害關係人

任何一條走向包容性開放的道路都必須克服兩個結構性障礙，一個依賴於物質資源，另一個則依賴於科學實踐中所涉及的象徵資本。第一個障礙是數位落差造成的全球不平等，以及開放性所給予，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所帶來的能見度和認可的，這些非霸權研究團體帶來的提取風險。第二個問題源自於學術出版和科學資訊的商業化和去商業化之間日益加劇的紛爭。這些衝突超越了「鑽石」與「黃金」路線之間的矛盾，因為科學家之間的認可和差異是在商業出版商設計的卓越制度下建立的。因此，真正變革的可行性最終與解決多種因素造成的不對稱問題有關。

拉丁美洲代表了一種替代性的開放取用出版體系，其中的鑽石期刊由社群管理，並以科學是共同利益的原則為驅動力。然而，「主流」圈子仍然讓大多數國際化研究人員相信高影響力期刊的表現效果，這使得他們不敢冒著失去認可的風險改變流通路徑。SciELO、Redalyc 和 Latindex 為提高其知名度和影響力做出了巨大努力，政府機構和公共機構也支持著這一地區巡迴活動。然而，這些組織定義的學術評估卻貶低了這些期刊，導致了一種至今仍未解決的異化。

包容性面臨著強大的排他性力量，這種力量是由寡頭商業利益相關者推動的，他們試圖集中有利可圖的商品，並在封閉的生態系統下集中化基礎建設。圖三顯示了左上象限中一些這類公司的例子。同時，在右上象限，符合 FAIR 原則的完全開放基礎建設（例如 OpenAlex）保證了能見度，但由於 DOI、ORCID 或其他持久識別碼（PID）的可用性，包容性受到限制。

在這個有爭議的領域的下象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觀點的強化：包容性與多語言和科學的跨文化性密切相關。然而，一些包容性出版平台在其服務中索引的文件層級的後設資料可用性方面存在限制，並且缺乏 PID 也會降低這種高品質索引產品的能見度。在我們全面遵守 CARE 原則、高度包容從屬群體以及保護原住民知識的過程中，自主治理可能會與不受限制的開放發生衝突。就數位主權而言，它可能意味著一定程度的封閉性。

在爭議領域內定位商業利益相關者和實踐



圖三

右下象限凝聚了包容開放的最佳典範。拉丁美洲的出版平台和儲存庫是走向公平研究系統的相關利害關係人。它們的主要優勢在於，各國政府在將科學定義為共同利益的普遍共識下，對基礎建設進行公共投資。這是一個異質的地區，擁有多元化的科學政策和科學資訊系統治理方法，它們共存於非商業出版生態系統中。LA Referencia 等聯邦基礎建設以及其在地技術的相關經驗使該地區在向包容性開放科學的公正轉型中發揮關鍵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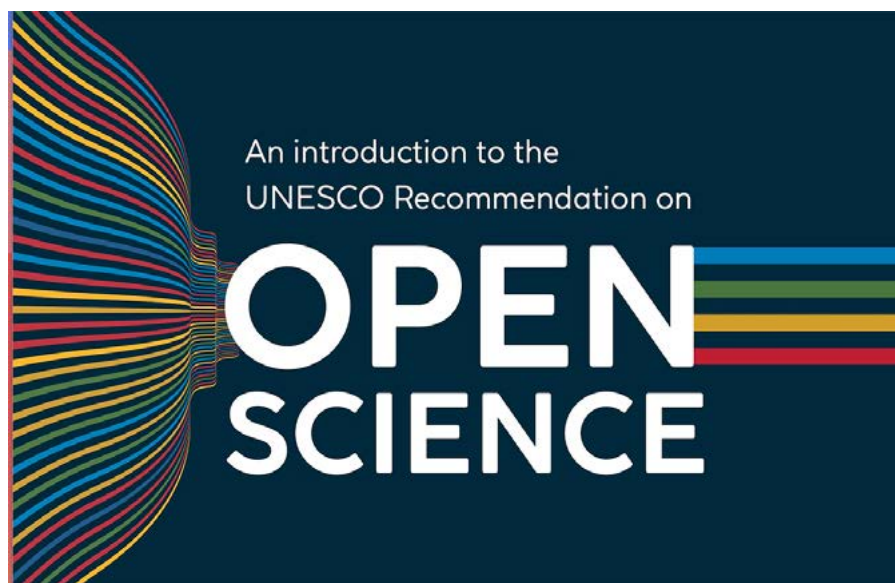
這些概念和實踐上的緊張存在著，與此同時大型期刊的擴張以及快速同行評審的承諾背後正在發生著嚴重的變化，模糊了特定學術團體和特定期刊受眾之間原有的互動。編輯管理的同質化和自動化使得編輯不再主導學術決策。商業開放取用的廣泛影響似乎引發了潛在的正當性危機，這為我們帶來了潛在的機會。我相信，只有透過對研究評估體系中脈絡化和「處境性」改革中的「卓越」概念進行深入批判，才有可能實現基進的改變。事實上，尋求包容性的開放需要對研究品質進行新的定義，以科學作為跨文化共同利益的多語言視野作為框架。■

來信寄至：
Fernanda Beigel <fernandabeigel@gmail.com>

> 開放科學的辯證：

在UNESCO針對開放科學提出建議的三年

Eunjung Sh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 (STePI), 南韓
Jae-Mahn Shim, Korea University, 南韓



出處：UNESCO，2022

> 「開放科學」與默頓理想

—— 十世紀中的社會學家 Robert Merton，基於對理想中科學知識該如何實踐與溝通的規範，提出了現在所謂的「開放科學」。他提出科學知識在揭示（它的客觀性）與建構（它應該是能自由存取）的方面應該是普世的。透過 Merton 對科學知識的普遍性規範，科學領域的學者被鼓勵透過公開討論與驗證所發現的事實，來追求普遍性的知識。也是如此，科學知識才能不受個別科學家的身分、區域差異與社會政治條件所限制。不過自從 Merton 提出「開放科學」的概念後的數十年以來，全球科學領域所想像、爭議與觀察的開放科學的實際規範，似乎與他的概念性的規範有相當大的差異。

近數十年來，研究人員在科學領域經歷了日益劇烈的商業化與同儕競爭問題。這種趨勢最終促使個別的研究人員，傾向他們的想法和研究發現保留在封閉的圈子內，而選擇不更開放地和其他社群中的同儕分享。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數位技術與網際網路存取的進步，使得科學出版品與研究資料得以公開發表，能讓相關利害關係人得以更及時地取得資料的。因此，正如Karl

Polanyi的建議，在以上這兩種情況的發展下，獨立的科學家與地方、國家與地區的科學社群已經見證了非常異質的開放科學的實踐規範。儘管 Merton 開創的開放科學的理想仍未改變，但開放科學所被實踐的實際狀況不僅是歷史性的，也必然是一個充滿了不同的想法與該如何實踐理想那爭議重重、辯證與建構過程。

為了回應開放科學的多層次辯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揮其召集力，在它 193 個會員中展開全球對話，並終於在 2021 年發表了《[開放科學的建議](#)》。該建議書同時支持科學知識在全球的普遍性與在地方／區域的多樣性，並且認為這是極需共同努力的目標。一方面，它重申全球對開放科學及科學知識應具備普世價值的觀點，這樣的觀點也使科學知識得以蓬勃發展。它呼籲全世界的在科學領域工作的人都該努力，在科學界內、外重振開放科學。另一方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建議書》揭示了實施開放式科學時不可避免的多樣性，並提倡多文化和多語言的知識系統。全球社會堅持默頓規範（Mertonian norms）的普遍主義；但在推進普遍性時，也需要認可和倡導多樣性的重要和世界各地的地方價值。

> 開放科學在南韓的發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建議書至今已通過三年。在這段期間，我們可以確認以下旨在闡述南韓（正式名稱為大韓民國）開放科學特徵的行動。相比那些已經完整建立有關開放科學政策或計劃的國家，韓國目前尚未有涵蓋討論開放科學該如何實踐的全面性框架。儘管如此，過去十年中，隨著全球對於開放科學議程的制定，他們至少產生了四個獨特的動向。

首先，政府資助那些已推動公共政策措施的機構，以提高公共資助研究成果的取得與利用。上述的策略是基於一個基本的邏輯：民眾應該可以由公共投資中獲益。尤其是 COVID-19 的爆發，加速了公共部門主動分享研究資料，以對抗公共衛生的緊急事件並保障公共物品。即便現在無條件地分享 COVID-19 資料已不再被實行，但針對公共資助之研究成果得以公開取用政策仍然有效。

其次，資料驅動研究（data-driven research）或 AI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對研究的輔助都促進了資料的管理與分享。私人公司、韓國政府和公共機構都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數據和資源進行投資。此外，針對所有科學知識領域提供服務的通用資料平台，也已在公共和私營部門出現。而且在特定領域的資料中心（生物研究、材料科學、生態學、地球科學、高能物理、公共衛生研究等等）和機構資料庫的數量也在增加，並且以特定學科或機構為中心的規則和標準也隨之被制定出。

第三，學術機構和圖書館也不斷採取能和全球持續發展的資料開放、取得出版的環境相互因應。隨著全球以及韓國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透過國際開放存取的期刊發表論文，國內圖書館也面臨更大的適應壓力。它們會被要求考慮舊有國際期刊訂閱之模式，並討論是否以能平衡目前訂閱成本費用的其他方式（如轉型協議），去推動資料開放存取的出版。而這種具「掠奪性」（predatory）的期刊和會議，毫無疑問地被商業利益主導，並成為推動資料開放存取出版的另一項挑戰。無可否認，學術出版界的產業正經歷轉型，促使學術界重新調整他們原有的行為模式。然而，不同學科、部門和地區的可取用資訊，以及與這些轉型的潛在風險各不相同，也導致出版的實踐經驗是非常不同的。

第四，公民科學家、當地社區和學術界外的人都已成為科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他們的參加和貢獻在生態學、天文學和公共衛生研究中尤其突出。新興科學參與者所引進的新穎觀點與興趣，會使得知識有嶄新發展的軌跡。與此同時，這些發展軌跡不可避免地會面對不同聲音或造成爭議的緊張局面。因為，人們傾向於保護在地環境中的內源性知識，但這種傾向正受到意圖將知識由本地環境拉向更廣泛的受眾傳播的呼聲挑戰。同樣，過往傾向保護受試者隱私身份的規範，也受到為研究目的而應該被破例的要求所反對。

> 開放科學的辯證

[知識社會學中的現象學曾建議](#)，任何事物的真實性與存在，它應該有一個理想的典型，並且建構在具體的類型與異質的辯證中，而這些類型與異質性往往是互不相連的。基於同樣的精神，本文簡略探討韓國開放科學辯證法的幾個不同發展。並就其現狀來看，每一個都是侷限於特定情境中的斷裂實踐經驗。只有歷史觀察者才能看到它們在未來幾年會變成什麼樣子。依據它們所遵循的路徑，[Robert Merton](#) 對於開放科學理想原型將會具體化與真實化成為現實。可以確認的是，開放科學正在這些細節中發展，並向我們迎來。我們只鼓勵人們更密切地關注像韓國這樣的國家，它們目前和未來的發展。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將在2025年進行的國家報告程序，將是一個提供各國開放科學進行辯證與討論的珍貴平台。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對這些辯證進行深入的社會科學研究，才能充分理解新興的全球開放科學的辯證，並瞭解我們所將面臨的具體任務。 ■

來信寄至：
Eunjung Shin <ejshin@stepi.re.kr>

> 非商業化的科學： 是否只能是烏托邦式的想像？

Ana María Cetto，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墨西哥



出處：基於 Freepik 影像的蒙太奇

正如 Mirowski 和 Sent 所指出的，「[科學的商業化](#)」是種異質現象，它無法用簡單的定義來界定；這也使得多數當代關於它的討論，至今都沒有令人滿意的結果。這樣不幸的狀態主要由於科學它本身的定義所造成，從作為既定知識體系的科學、作為制度規範的科學，到作為過程的科學，甚至到科學作為一種過程的產品，所有都是能代表科學的定義。由此，本文標題所提出的問題含有許多層面，適合採用多面向的方法討論。本文所提出的方法難免有其片面性和局限，但討論將主要聚焦於科學的商業化。

> 從歷史的角度一瞥科學發展

透過檢視歷史會發現，科學在被構想或命名前，貿易已成為知識生產、使用和傳播的重要推動力。尤其歐洲人

所建構的科學知識體系的發展，很大程度是受益於來自遠方領土的知識，而這些知識可能是透過航海、殖民或征服而來的。因此，這些知識若被去脈絡化，它就會成為科學文獻的一部分，甚至是經濟利益的來源。幾世紀以來，南方熱帶地區的香料、藥草和其他天然物產的貿易就為歐洲的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

另外，幾個世紀以來，知識一直都是在全世界被產生和分享的。猶太裔的葡萄牙醫師 Garcia da Orta 所建立的知識網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563 年，他因為在果亞邦首次出版關於亞洲水果和草藥醫療用途的著作而聞名。事實上，Garcia da Orta 與印度、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的宮廷醫師，以及航行到中國、印尼和東非沿岸的旅行者所建立的網絡關係，是 Garcia da Orta 這些知識重要的來源。但 Garcia da Orta 也是個生意的人，

>>

他推廣了藥用植物和寶石的銷售，並將它們出口到歐洲。此外，他的著作內容複雜、篇幅龐大，其中 [59 章還被翻譯成簡易版的著作](#) 在歐洲流傳，著重於挑選最有用的藥草類別，以作為醫療和商業用途。毫無疑問地，自十九世紀以來，他就被描繪成一位「科學偉人」和「熱帶醫學的先鋒者」。

自十五和十六世紀的大發現和征服航行以來，知識從全球南方向全球北方的流通就沒有停止過。不過，這也導致這些產品知識脫離了根源，而被商業化。

> 資金製造機

歷史上知識流通的不對稱，至今仍然存在。在全球化時代，無論是全球北方還是全球南方，我們皆在不同程度上對今天人們所知的科學知識做出了貢獻：在國際社會中，每個人們都是一個被不斷成長和日益成熟的實踐者，而我們也滋養出了政治和經濟合法化的知識體系。然而，不對稱的現象仍然存在：全球南部對科學的貢獻，其商業價值較低，也因此市場對它的興趣就較少。除此之外，一方面，我們的科學產品在自身國家很少被用於具經濟價值的應用；另一方面，它們也大致被全球北方的實踐者忽視。

簡而言之，我們的科學在相當程度上是屈服於一個有權、有錢、有手段來決定哪些科學才是「重要」的體系——它是一個深受二戰後，以效率為主體的泰勒科學管理模式 (Taylorist efficiency models) 啟發為原則的工業體系。科學產品的商品化、科學出版及其影響主因——「貨幣」，上述都是科學企業工業化可想而知的結果。

讓我們回想一下，商業出版模式是在私營公司開始接手學術機構的期刊出版時出現的，而學術機構在上世紀的前半期仍是主要的出版商。這些學會會將編輯與行政管理交給商業出版商，並偶爾收取報酬以支持學會的活動。Robert Maxwell 將這些出版商形容為「永久的資金製造機」，因為它們在看到了有利可圖、具龐大市場價值的商業模式後，就提出了一個富有野心的計畫。因此，科學家會做所有實質性的工作，不只是製作內容，也就是科學家不只產出所謂的「原始資料」，它們也會擔任編輯和審查其他作者的手稿。而後，這項安排更擴展到所有稿件的打字與格式編排，在網際網路時代之前，稿件必須「準備好印製」(camera-ready)，而現在則是「上傳就緒」(upload-ready)，將稿件送到期刊平台。但若是依照此模式，出版業還能要求什麼呢？

> 一瞥現況

事實上，還有更多事正接著發生。在研究成果商業化的同時，書目數量和科學計量的服務也隨之誕生，許多地方也將其作為（個人和機構）「優秀表現」的指標，並加以推廣這樣的評斷標準。這也促使科學活動自二戰結束以來持續地擴張。

然而，這種由商業驅動、著重於生產力的擴張，並沒有伴隨著相應成長的科學品質和發展；甚至，有些分析家提出科學反倒呈現了停滯的狀態。這樣的情況，在科學內外應用以及現代技術的基礎的基礎邊陲研究方面尤為明顯。此外，由書目獎勵措施所創造的市場，再加上開放取用的「黃金」模式之採用，使得少數的大公司形成了跨國的寡頭壟斷，它們負責了全球約 75% 的已發表論文。更甚，這些公司在機構或國家層面簽訂商業協議，它們將價格逐年提高，現在已超過了通貨膨脹率和許多學術機構的預算能力。這樣的結果，造成了公共財的嚴重流失。

我們必須了解，這些大型牟利出版公司的出現，並非科學霸權體系的失敗，而是體系本身為了維持霸權地位而造成的另一種狀態。若要找對象責怪，我們應該把焦點放在市場主導的體系上，這樣體系幾乎滲透並顛覆了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尤其是關於人類所創造的事物。要不然我們怎麼能理解，在藝術領域，一位年輕的美籍華裔企業家花費 620 萬美元購買了一件由固定在牆上的香蕉組成的「藝術品」，只為了在記者會上吃掉它來「創造歷史」？

> 知識作為公共財

Hardt 和 Negri 在分析資本主義的新特徵時，顯示了公共財——那原該屬於全人類的東西——如何被市場和金融體系封閉了。空氣、水、地球上的果實和大自然是公有資源，它供給了我們一切；而社會生產的成果也同時該被劃入公有資源的範疇中，例如知識、語言和資訊。後者是社會生產的資源，因此屬於我們所有人；然而，由於資源的被商品化，絕大多數人無法獲得它們。

科學知識是一種公共財，更多人獲得，並不會降低它對任何人的價值；相反地，它會讓我們更充實。原則上，科學知識應該是高品質和值得信賴的，這樣才能獲得大眾對科學活動及其產品的廣泛支持。儘管，人類社會目前所實踐的，與上述的理想相去甚遠。

在討論公共財的管理時，Elinor Ostrom 並未區分自然資源與知識等非物質資源。在這兩種情況下，她認為個人管理資源的能力各有不同，這取決於社群是否有可能並願意制定一套協議和遊戲規則來管理。

> 將科學出版非商業化，以保留所有權並控制傳播

根據 Ostrom 的論點，學術界必須願意自我管理；具體來說，就是重新掌控知識產品的出版。在這方面，拉丁美洲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好榜樣，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科學期刊都是由非營利的學術機構所出版的。因此，我們需要公共政策來糾正知識生產傾向商業出版的矛盾做法，並防止由國家公共資源資助的科學知識生產群體，繼續臣服於壟斷市場的出版大公司。

自「鑽石」(diamond) 開放存取一詞在全球北方被提出，而全球南方在此概念被提出後就採用了此概念，讓

作者與讀者可免費出版。現在，這樣的出版模式已成為拉丁美洲的主流做法。它確保學術界保留對其產生的知識的所有權，並管控其傳播的管道，建立使它應該被獲取的良好渠道和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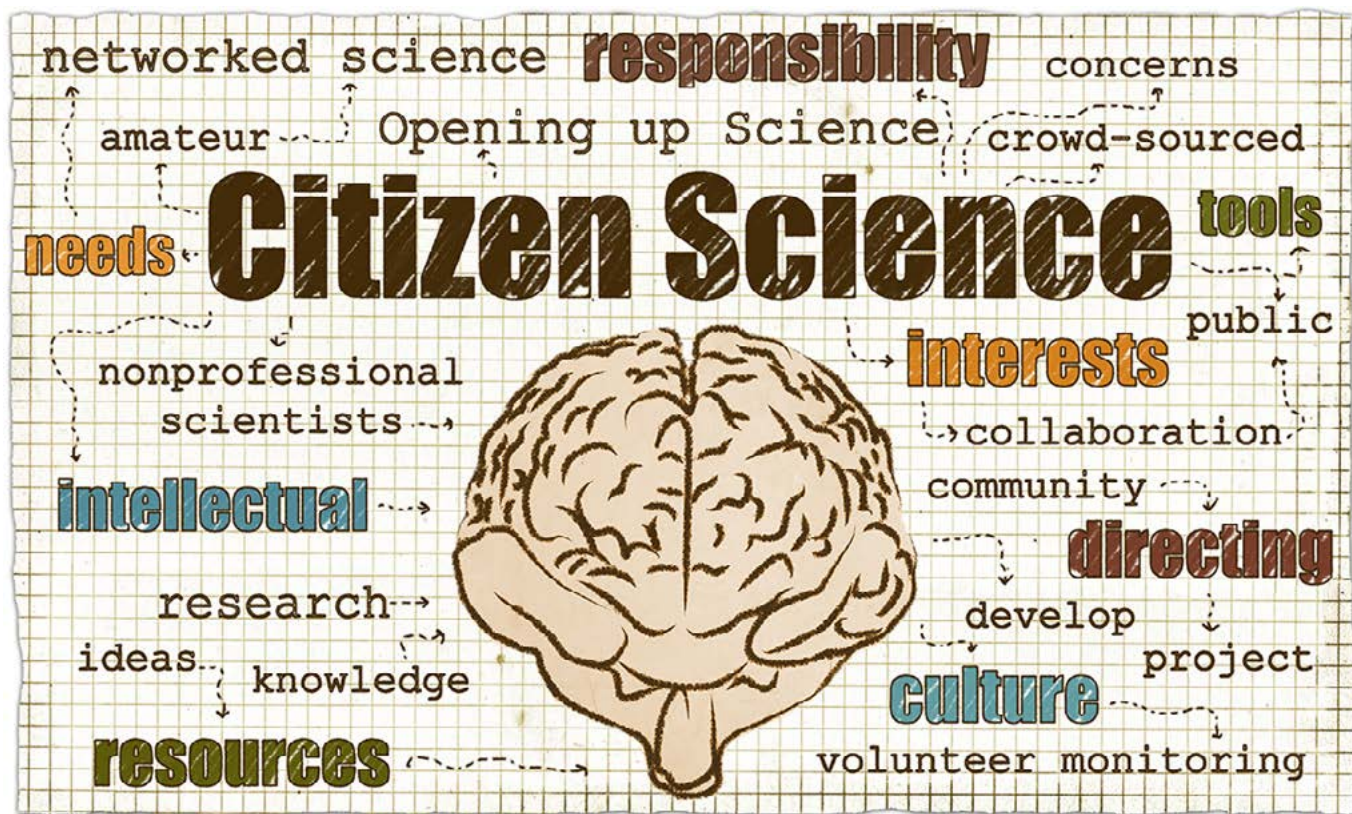
將科學知識非商業化，可能是一項相當艱鉅的任務。因為除了處理其他事項外，還需要對科學的社會價值與目的進行全面性在心態上的轉變。出版業的非商業化，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是在現實層面，需要政策制定者與科學界的一致採取行動才能帶來改變。有些機構正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第一步，取消訂閱大型營利性出版商的刊物，或是改變學術評估的標準。然而，這只是一連串改變的開端罷了。 ■

來信寄至：

Ana María Cetto <gna@fisica.unam.mx>

> 公民科學與新型的權利議程

Sarita Albagli, Brazilia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BICT) 和
公民科學研究所，巴西



出處：TL Furrer, 2017, iStock

公民科學在近二十年來蓬勃發展，提高了各國公眾政策和國際組織議程對其的重視程度，並與社區科學、參與式科學和科學的公眾參與等活動對話。公民科學包含了多元的概念、實踐、方法論和主題；它亦是一多義詞，會根據使用的對象以及其動機、目標、觀點和背景有著不同的詮釋和定義。公民科學將隨著當下的脈絡和條件扮演不同的角色，它可以是追求社會貢獻的一起科學計畫，也可以是追求科學團隊支持和認證的社群倡議。

> 實用與民主的觀點

這裡有一個值得先探討的問題：「公民科學是為了什麼？為了誰？最重要的是，在什麼條件下？」我們可以從公民科學計畫中觀察到兩種觀點，它們不必然得對立，反而可以是互補的。

一方面，從比較實用的角度來看，公民科學的動機是動員非科學家們去收集、分析資料，以減少成本、加快研究的速度，並擴展研究領域。科學領域對異質和各地區資料的需求越來越大，這也代表單靠科學團隊的努力在大多數的情況中已不再是最有效的方法。

另一方面，公民科學要求不同社會團體的知識和觀點盡可能地被看見和認可，以此提供新的科學洞見並為社會創新和問題解決創造新的貢獻。以上是從更公民的角度看待公民科學的觀點，要求尊重聆聽並且創造不同知識類型間對話機會的模式，這其中包含了由下而上、參與式和共同生產的方法論。

> 制度化和多元性

公民科學的其中一個挑戰是要如何在容納多元觀點的同時，確保公民科學計畫的長期發展。一方面

>>

來說，這要求研究審核制度和金援體系對公民科學的認可及資助；另一方面，則又需要避免過去僵化的制度模型，以固定的標準來定義何為公民科學計畫；而是能夠肯認公民科學的多元、開放和創新性。我們需要將這種科學方法視為一個仍在建構且不斷改變的概念與過程。

不同類型的倡議不必然需要被稱作公民科學，不過仍可被視作領域中的一環。在拉丁美洲已經累積了大量在研究和教育中使用參與式取徑和方法論的經驗，哥倫比亞社會學家 Orlando Fals Borda 和巴西教育家 Paulo Freire 的開創性研究證明了這一點。

在巴西，自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以來，公民科學倡議已逐漸受到關注。自2021年巴西公民科學網 (Brazilian Citizen Science Network, RBCC) 創立至今，吸引了超過四百名的參與者。2022年4月，巴西的科學與科技資訊處推行了一個[公民科學平台Cívís](#)，上面登記了超過兩百件拉丁美洲的公民科學倡議和計畫，其中有過半數來自巴西。這些倡議中包含提起人們對賞鳥等科學休閒活動的興趣（詳見[Wikiaves](#)）；受社會環境災害的社區在大學團隊的協助下，統計資料並以此為社區的權益抗戰（詳見「[Que Lama é Essa](#)」：這是什麼泥土？）；動員公民科學以對環境保護做出行動的計畫（詳見 [Blue Change Initiative](#)），和保護海洋與沿岸環境品質的計畫等。

> 公民科學作為一種開放科學

公民科學目前屬於開放科學運動的一支，不過關切的重點不僅僅是開放數量的面向，也就是知識取得的途徑，也包含了品質層面——即關注我們希望生產的知識類型，亦即對多元觀點的開放性。這也就代表了，公民科學的實踐和方法不僅限於開放取用和開放資料的原則與協議。因為考慮到參與公民科學倡議的異質行動者各自處在不平等的地位和位階，所以開放資料不僅需要依循可觸及、可取用、可協同操作和可重複使用的公平原則，它還需要關注原住民所提出的照顧原則：集體利益、控制權威、責任和倫理。在可行的情況下，還需要採用預先、自由和知情同意的協議，確保將研究結果回饋給參與者，並提供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機制。

隨著公民科學計畫對手機軟體、錄音和測量工具、偵測裝置和數位平台等數位工具的使用量增加，開放基礎設施同樣也必須受到關注。儘管這些裝置促進了數據生產和記錄的去中心化，但同時也致資料於竊取和盜用的危險之中。這涉及到新興的平台經濟——或說平台資本主義——將威脅到資料的主權，也就是資料所有者對於資料生產和使用決策的能力和自主性。這些平台通常都提供了使用者友善的

操作介面，卻鮮少提供他們營運與獲利策略的相關資訊。除此之外，人工智慧的廣泛應用不只帶來了機會，同時也存在某些危機。不只如此，數位排斥的問題仍舊存在，影響了那些仍無法充分取用網路的地區和社會群體，並使他們容易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影響和操控。

以上的這些問題和其相對應的措施都必須被納入公民科學計畫的考慮範疇中。

> 衝突場域中的公民科學

有人認為我們需要公民科學來解決當前的全球社會環境危機，然而建立一個「共同的未來」並不一定是合意或和平的。這些危機的原因和影響不均勻地分布在國家、地區和社會階層間，因此想要解決這些問題往往涉及對世界觀和發展模式的不同乃至於衝突的立場。以環境保護和自然開發力量為例，兩者之間尤其在涉及高度社會不平等和政治脆弱性時，常會出現爭執，甚至暴力行為。對於尋找替代發展模式的壓力，在多大程度上會使科學逐漸包容其他價值或實踐，甚至促使科學權力結構發生範式的轉移？

許多人指出西方科學的範式為發展和認識其他多元的科學軌跡和知識類型設下障礙，而這些被隱蔽的知識正可能是發展永續的途徑。在此脈絡下，出現了一套有關知識和科學的反霸權論點，用米歇爾·傅柯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被征服知識的叛亂」。它們源自受到社會運動啟發的各種思想脈絡，包括環境保護主義、女性主義及酷兒理論、反種族主義、後殖民與去殖民主義、底層研究、被壓迫者的教育學、知識生態學和全球南方的認識論。

倡導以上思想脈絡的人們力求讓傳統和原住民、高風險群體、弱勢人口、污名化群體和非正式專業或經驗的知識以及邊陲科學的世界觀和認知框架得到更多關注。他們的目標是讓這些人的角色在面對當前全球危機時被重視，並倡導他們所認為的認知正義、範式轉移與邊界思考等理念。

> 對抗假訊息：科學與社會之間的對話關係

在這些情境中，公民科學的角色不僅限於填補資料的缺口，以監測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程度。它還發展出與不同思想和行動脈絡的對話、促進不同本體認知基礎間的互動，也就是不同生活和知識理解間的互動，並且使與生命永續性更具平衡連結的知識實踐被看見。公民科學同樣作為一種科學和環境教育的手段，促進科學與社會之間的對話關係。在當前社會充斥假訊息和抹黑科學的狀態下，例如伴隨著假消息和假科學的散播，出現的否認氣候問題或反疫苗等活動，公民科學作為一種教育手段尤為重要。

>>

公民科學可以成為強化公民身份的契機，對那些原本被排除在外的人而言尤其是如此。在使不同行動者和知識場域之間的關係更加水平化的過程中，公民的概念也正在被重新詮釋。公民科學可以提供工具來支持數據和認知行動，以擴展對區域管理和公眾政策的社會影響，這其中也包含了一種嶄新的權利議程，特別是「研究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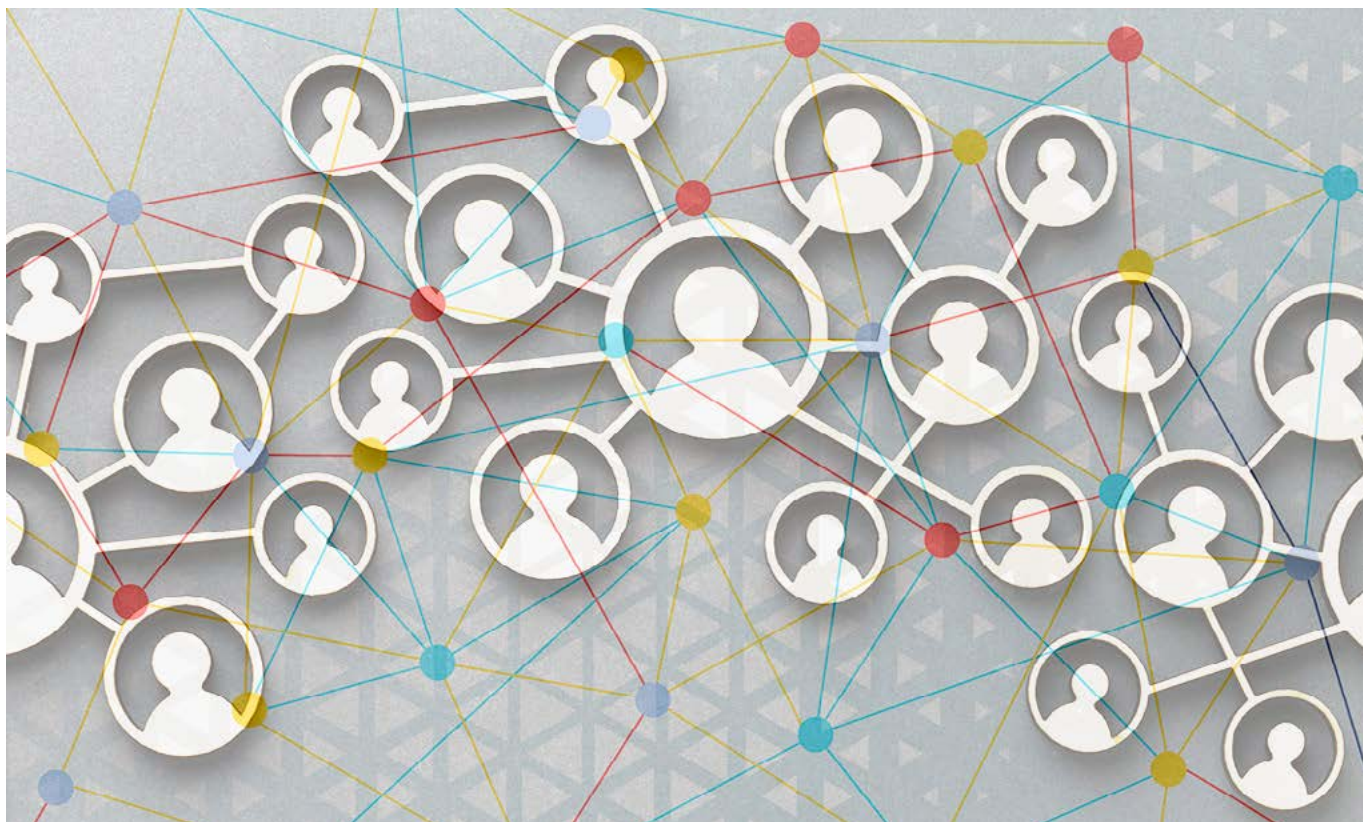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希望促進一個科學內部和超越科學範疇的廣泛對話，那以上所討論的將是一個關鍵的議題。這類對話的存在也代表了，一種從不同知識體系間共存倫理發展而來的多聲視角正在形成，呼應了溝通一詞的原始意義——「成為共同體」。■

來信寄至：

Sarita Albagli <sarita@ibict.br>

> 重新思考開放科學： 邁向公平與包容的關懷

Ismael Ràfols, UNESCO Chair in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 Global Science, Leiden University, 荷蘭, INGENIO, University of Basque Country (CSIC-UPV), 與 Universitat Politècnica de València, 西班牙



出處：基於 Freepik 影像的蒙太奇

> 成長的陣痛期：更多開放科學面臨矛盾加劇的情況

開放科學（Open Science, OS）代表了一種新的科學工作模式。它以合作工作和分享知識的新方式為基礎，通常透過數位技術或其他合作工具來進行科學工作。此外，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21 年的一份建議書中所表達的，希望開放式科學將「為了科學和社會的利益而擴大科學知識的普及，並…（中略）…促進創新和參與創造科學知識，以及分享科學知識帶來利益的機會」（[UNESCO, 2023](#)）。

有鑒於這些潛在的好處，開放取用的出版物、資料分享和公民科學等活動被更大力地推廣，尤其是在過去十年內，這些活動已越來越普遍。然而，我們最近針對

開放科學分析後，發現了一些令人憂慮的趨勢——是的，開放科學正在蓬勃發展，但它拓展的方式卻讓人懷疑，它是否真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公平，並提升科學的社會影響力。

總體來說，人們的目前對發展開放科學之作業系統的印象是，它似乎出了某些問題：第一，[目前的開放科學正在導致更多的不公平](#)；此外，[目前發展開放科學的方式，所造成對社會的影響，我們是不清楚的，或說它是有其限制性的](#)。

首先，開放科學造成更多不平等的討論上，有更多經濟資源的大學和國家的研究人員（就像我的情況），比身處資源貧乏環境中的研究員享有更耀眼的特權。因

>>

為我們的機構可以支付（通常是相當昂貴的）費用，並透過開放取用（Open Access）發表文章。儘管這樣會讓一些知識變得容易獲得，但卻違反了基本原則，即科學貢獻應該依據其學術價值，而非作者的財富多寡來被評判，或得以刊載呈現出來。因此，許多相關人士認為，付費出版模式（過去稱為「黃金」或混合開放科學）正在使研究體制敗壞墮落。「鑽石」的開放取用（免費的出版與閱讀），顯然地造成出版商的損傷，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東歐等地區。因此，在西歐，出版的潮流由付費出版，也逐漸轉向機構支持「鑽石」的開放取用期刊。

其次，根據近期的一則評論：到目前為止，人們對開放科學的社會效益瞭解很少。其實，公民科學和其他參與方法，像是與政策制定者和利害關係人的互動，像這樣的社會互動，才是研究結果主要能被實踐和做出貢獻的方式。換句話說，社會影響很少能單單透過論文或資料發生，是透過社會這個舞台，在社會參與者與研究人員之間來回「轉移」（transfer）知識才得以被實踐。這些質疑的發現，目前是聚焦在許多開放科學政策在技術平台上的投資。

根據這個觀察，我將論證開放科學的概念化和推廣開放科學需要重新思考的部分，如此一來，我們才可能達成知識正義的目標。

> 開放科學是一種轉變，但它轉變的方向為何？

正如我們所見，開放科學的發展有兩個主要動力。第一，資訊數位化帶來了生產、傳達與儲存科學知識的新方法。第二，期望這些開放科學的新方法更能促進科學與社會的互動，已和科學對社會影響的批判被聯繫在一起討論，我們希望科學研究更能回應社會的需要、所求與期望。

根據我們追求開放科學的原因與期望的目標，我們為它的實施制定了不同的議程。部分更著重於提高研究系統的效率，部分則著重於平台技術的開發或是擴大資訊的擷取的範圍，也有部分專注在系統的參與度程度。雖然原則上這些目標應該是相輔相成且不相互違悖的，但在實踐過程卻出現了緊張和矛盾的狀態。

如果我們把開放科學理解為研究系統的改革，那麼開放科學的每一個願景都會把研究推向一個與其他願景互不相容的方向。例如，從資訊平台的角角度來發展開放科學的話，往往會與開放科學的包容和參與程度產生衝突，因為在全世界人口中，部分階層的人們並未享有或具備透過這些平台參與的能力。或者，舉例來說，透過付費出版模式實現更多的開放取用，在公平性（因為資源不足的環境下，研究人員則無法付出足夠費用取得資料）和研究倫理（因為某些付費出版的期刊，如 Frontiers 或 MDPI，它們審查的嚴謹程度是備受質疑的）層面，也和開放科學的中心思想相違背。

總而言之，開放科學的未來並非只有一條路，它其實有更多不同的潛在走向，這些走向也決定了開放科學是具備了哪種類型的存在。因此，我們要問的問題並非是邁向

更多開放科學其進展的程度，而是究竟哪種類型的開放科學被開發、採用？它又是由誰開發和被誰採用？以及使用這類型的開放科學，會帶來怎麼樣的後果？

科學政治經濟學家 Philip Mirowski 曾警告，主流的開放科學和它資訊的基礎建設與「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息息相關，此現象的詳細狀況可參見 Soshana Zuboff 的「監視的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此外，它還涉及類似 Google 和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所擁有的危險：Elsevier、Clarivate 或 Springer-Nature 等等大型壟斷市場的公司研究的階段（從實驗室筆記到出版、評估分析等），它們控制了公開的研究資訊，並有權力塑造集體行為與科學願景。而且這些公司通常在美國與歐洲政策的支持下（例如早期的 S 計劃），不僅從全球南方大肆攫取財富，也有可能製造出強化全球北方霸權的科學表象的能力，使其主要的科學議題、學科、語言、價值觀與文化觀點更為明顯。

儘管如此，在這些平台的平行與摩擦發展下，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都在發展集體倡議，為多元與包容的開放科學軌跡提供其他可替代的方案。例如，La Referencia、亞洲參與式研究、公共知識計畫或巴塞隆納宣言。問題在於，在未來可選擇的開放科學路徑中，哪個方向更符合知識正義。

> 由誰來推廣開放科學？又是為了誰而發展開放科學？

根據202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開放科學的建議書，它們將公平和集體利益確立為開放科學該追求方向與最關鍵的價值。這樣的重新定義，對於開放科學影響甚大。它以《世界人權宣言》為基礎提及：「每個人皆有權利自由參加…（中略）…和分享科學進步及其所帶來的利益」，它們將科學知識視為全球的公共財，並將開放科學中的「開放」兩字，視為使知識真正成為公共和全球知識的目標。

正如 Michel Callon 所說，科學並不是一種傳統的公共財。因為它不僅要參與者參與其生產，還要顧及它的製造、維護和使用；因此，我們需要對作為這樣的參與者來投資自身實質的能力。因為，任何公民都會呼吸到乾淨的空氣，他也是一種公共財，但卻不需要特別的努力來維護它，甚至不一定會意識到原來它也屬於公共財的一種。然而，我們若要參與科學知識的生產和使用，那麼備有先備知識以及互補的資源和能力，則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舉科學專業知識的例子來說：我們可以取得有關癌症的科學刊物。但即使如此，在診斷出癌症病徵時，只有專家才能使用這些科學論文來決定採取哪種適當的治療方法。而我們其餘的人，則需要仰賴針對一般讀者的科普報告；因此，這些科普資料（非科學論文）是知識分享的關鍵。

關於資源，我們仍可以假設中低收入國家的研究人員還是可以取得擁有科學知識資料的網站。但實際上，他們往往無法使用這些網站資源，因為資料分析需要基礎的建設或是特定人員來操作，但他們通常卻負擔不起這些費

用；在最壞的情況下，光是網際網路連線，可能對於他們來說就費用昂貴，或是網路收訊不加，甚至可能發生被封鎖（因為被制裁）等問題。

簡而言之，在全球南方，網路的可取用科學資訊往往無法被善用。文章、資料、軟體等等的科學資源與產品可以公開使用，是受益了本就擁有強大能力與資源的組織與公司。即便如此，仍需要針對個案地去「移轉」（transfer）與幫助個案適應，才能讓知識觸及到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口，並使他們成為受惠對象。若是僅僅以數位化的方式提供知識，主要受益的還是那些已經有機會獲得知識的人，而無法促進世界上多數的人口參與在分享科學所帶來的好處中。這就是為什麼目前開放科學所採取的方向，亦即它專注在科學產品的免費使用這方面，事實上並沒有帶來更多的公平和知識上的正義。

> 脈絡化的開放性情境：從「獲得知識的產出」到「與知識連結」

儘管，另類形式的開放科學可以帶來更多的公平和影響力。由 Leslie Chan 領導的開放與合作科學發展網路（OCSDNet） 提出了達成科學知識的開放性目標需要情境化的論點。也就是說，只有在特定的背景下，研究人員和利益相關者才能發展特定形式的參與和溝通，這也使科學知識對特定的社會群體（如：邊緣化社會社群）有了價值。

這種情境的脈絡化並不能單透過專注於讓研究產品能被數位化取用來實現。相反，正如 Sabina Leonelli 在近期一本書所發表的，重點應該放在研究人員與社會社群之間的知識交流過程。這些過程通常會受益於數位產品的開放取用。但儘管如此，特定形式與平台如何被使用，是會隨經歷特定知識交流過程的不同參與者而有所差異。

開放科學運動承諾了實現知識正義的母標。許多社運參與者認為，私人參與者（主要是寡頭壟斷的出版商）搶佔了目前的發展，但或許那些強大學科（例如基因組學與高能物理）的大型研究基礎設施被發展也是由此原因而起。最後，為了重新獲得解放的力量，以及對公平與包容的關懷，開放科學需要重新定義自己，而非從產品與技術平台的角度（許多產品與技術平台都被產業組織或「大型科學」機構所有），而應該是在更謙虛平等的環境中，跨越更廣泛的社群，來進行知識的交流。■

來信寄至：
Ismael Ràfols <i.rafols@cwts.leidenuniv.nl>

> 極化與政治的衝突： 來自拉丁美洲的洞察

Gabriel Kessler，阿根廷國家科研委員會-拉普拉塔國立大學/聖馬丁國立大學，以及
Gabriel Vommaro，阿根廷國家科研委員會-聖馬丁國立大學

出處：Matheus Ribs，[@o.ribs](#)，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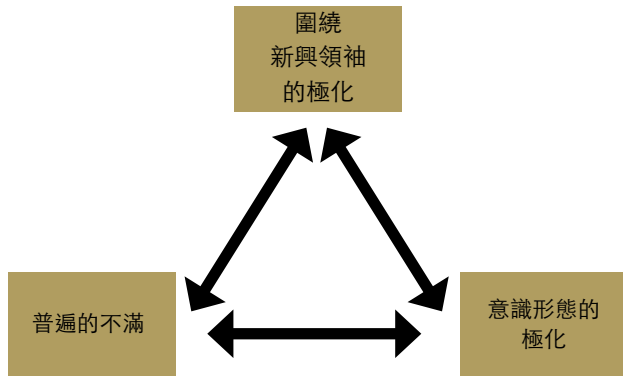
正如 [Gabriela Benza](#) 以及 [Gabriel Kessler](#) 所指出，拉丁美洲經歷了始自 2019 年並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間惡化的，一段不滿情緒日益高漲且社會政治衝突加劇的時期。那些在二十一世紀初煽起變革之風的左翼勢力，最終成了受到挑戰的「建制派」。與此同時，右翼反對勢力的崛起預示了一場政治轉向；但這一轉變最終沒有發生。隨著大宗商品繁榮（commodity boom）的結束，拉丁美洲的政治不滿日益加劇，隨即又因疫情而得以深化。這種不滿體現在大規模抗議、選舉行為的各種變化、對民主保持的負面態度，以及激進右翼主張的出現。

在上述背景下，我們提出兩個問題。衝突在不同國家中是如何被組織的？對區域的民主而言，這些衝突的結果和挑戰是什麼？為了回應這些問題以及其它相關問題，由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資助的 [POLDER](#) 計畫（全稱為：拉丁美洲的極化、民主與權利計畫），在 2021 至 2023 年間運用了混合性的方法，對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薩爾瓦多和墨西哥等五個國家進行了全面的比較研究。

根據我們的調查，我們認為，隨著大宗商品繁榮的結束，拉丁美洲的社會衝突能歸納為三種類

型的情境：帶有情感因素的意識形態極化（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with affective components）、圍繞新興領袖的極化（polarization around an emerging leader），以及普遍的不滿（generalized discontent）。如圖一所示，這三種類型是動態的並且不遵循預先設定的順序。

當代拉丁美洲的不滿情境



圖一

> 三個案例分析：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

在 POLDER 計畫所研究的國家中，阿根廷與巴西，和烏拉圭一樣都屬於意識形態極化的案例。在哥倫比亞則有著普遍的不滿，這和秘魯與厄瓜多爾是類似情況，雖然有著細微差異。而屬於圍繞領袖極化之案例的，有在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執政下的墨西哥，以及 Nayib Bukele 所領導的薩爾瓦多。我們會以這三個案例來闡明上述所說的三種類型的情境。

在巴西，極化伴隨著一次「左翼轉向」而在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發生了，該次「左轉」是圍繞著一個由工黨（葡萄牙語縮寫為 PT）、公會以及社會運動所組成的穩固的社會-政治聯盟而建立的。如 [Singer](#) 所主張，工黨政府在指定再分配政策的同時也推行了進步文化、性別與人權等政策。[Samuel 和 Zucco](#) 則指出，當 Bolsonaro 出現在競選場合，他代表的是那些分散和異質的選民，這些選民之所以聚集在一起，首先是因為他們拒絕工黨（如 [Santos 和 Tanscheit](#) 所指出），再來是因為與沒有充分表現出對 Lula 及其政黨的文化與經濟不滿的主流右翼意見不合（如 [Rennó](#) 所指出）。

而在哥倫比亞，根據 [Botero, Losada 和 Wills-Otero](#) 的論證，即便身為自由黨的領袖，Álvaro Uribe 仍成為了傳統政黨候選人的威權替代選項而於 2002 年崛起。在「民主安全」（democratic security）的框架內，Álvaro Uribe 對國內武裝衝突的強硬政策成功地塑造了政黨品牌。2016 年的和平協議公投呈現出高度的選舉極化，並且反對協議者和宗教保守派之間形成的策略性聯盟。然而，投票的非黨派性質有礙於社會-政治聯盟的鞏固，這些聯盟可能會為選民制定不同的議程。在 2018 年，全國層級的左翼候選成功進入了第二輪的總統選舉。而在 2022 年，這股勢力成功致使其領導人 Gustavo Petro 掌權。

在制度革命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長達七十年的統治以後，墨西哥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經歷了民主開放的進程。由三股競選勢力共同形成的競爭系統出現了：首先是制度革命黨，作為一個大眾型政黨，憑藉其模糊的意識形態組成維持了自身的影響力；再來是作為保守政黨的國家行動黨（Partido Acción Nacional）；最後是民主革命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mocrático），一個中左翼政黨。在 2006 年的總統選舉中，民主革命黨被一股帶有鮮明的重建性基調的新運動所吸收：國家再生運動（Movimiento de Regeneración Nacional）吸收了民主革命黨大部分領導層及基層成員。國家再生運動的領袖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即所謂 AMLO），以反對政治建制及其「特權」的言論在 2018 年成為了總統。同一政黨的 Claudia Sheinbaum，在 2024 以高票當選。

> 國家情境於社會層面的不滿

不同的國家情境如何影響社會不滿的形塑？在我們的論述中，與 [Ken Robert](#) 關於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義政治情境的討論一致，我們認為是代議者（agents of representation）提供了社會組織不滿情緒的框架。以巴西的案例來說，如 [Kessler、Miskolci 以及 Vommaro](#) 所指出，工黨選民在文化及經濟問題上持進步立場。而 Bolsonaro 的選民在這兩方面都相對保守。在針對政治菁英普遍不滿的情境中，政黨雖然組織了政治局勢，但作為代議者卻相對薄弱，因此無法在社會層面上組織衝突。哥倫比亞就是這種情況，如 [Kessler 等人表明](#)，選舉偏好和意識形態立場的相互關聯較弱。而當極化情境圍繞領導人而展開時，這種兩極分化則主要發生在選舉層面，但不會在社會主要議程種組織偏好與訴求。與哥倫比亞的情況一樣，墨西哥的選舉偏好和意識形態立場相互關聯較弱。

我們所定義的三種情境也對組織衝突的不同面向有所影響。第一個明顯的影響是對社會層面的議程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高度極化與對政治更強的關注程度之間存在相關性。民意明顯與投票選擇保持一致。這些觀念與社會-政治聯盟提供的框架相關。巴西有更多關於權利的論述和語言，而基於個人標準的論點則較少。而在墨西哥和巴西，有更高的政治關懷以及政治資訊的獲取。另一方面，哥倫比亞是政治最輕微的案例，這是因為其更多地側重宗教框架，同時對政治資訊的獲取較少。

第二，存在著不滿情緒的意識形態對齊（ideological alignment）的影響。高度的對齊意味著，在議程上組織立場的框架遵循著左右分野（及其國家特殊性），後者一般與主要競爭的社會-政治聯盟有所關聯。在具有意識形態極化的巴西，能夠輕易分辨出不同競爭選項的選民之間意識形態的邊界。在哥倫比亞則流行著普遍的不滿情緒。機會的缺乏以及對菁英的負面看法引發了對競爭環境不公的認知：彷彿一切都已經被只考慮自身利益的菁英所擺佈。而對競爭環境不公的觀念進一步引發了冷漠與憤怒。在墨西哥，關鍵的因素在道德方面，以及對墨西哥近代歷史中主導人物的質疑，特別是在腐敗和特權的問題上。

情感極化的程度和內容在三種情境下也有所不同。巴西表現出以意識形態極化的方式對競爭對手最高度的道德否定。據此，情感的極化反饋到意識形態對齊而不是加以取代。能夠從哥倫比亞觀察到明確的對比，那裡只有在小而強硬的選民群體中才會出現對對手的負面看法。與此同時在墨西哥，意識形態對齊也是分散的。儘管如此，AMLO 的形象可能會促使社會進行意識形態重組，也可能僅僅成為一次難以持久的民粹動員（populist interpellation）的經驗。

> 情境的概念化和極化的處境

透過我們對情境的概念化而呈現的動態特質，對極化處境具有影響力。眾所周知，極化對民主活力有不均衡的影響。它組織了不滿情緒，造成了高度的政治化，但它也在社會層面上引發了大量的敵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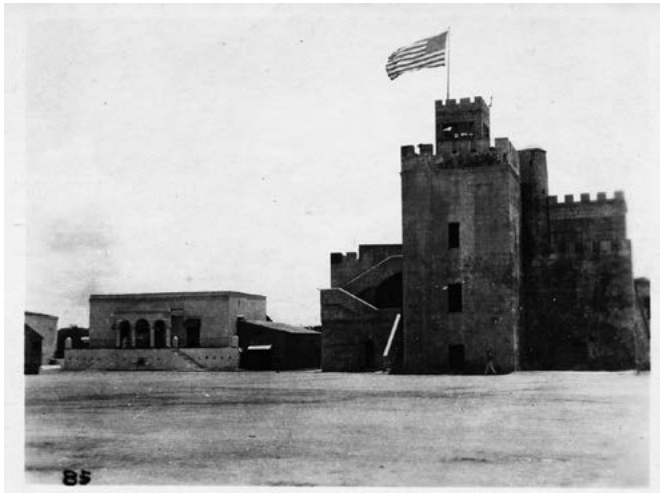
圍繞新興領袖的極化情境可能為威權導向提供成長的空間。這種情況卻沒有發生在墨西哥，Claudia Sheinbaum的總統任期似乎預示著民主的深化。然而，其它新興領袖承諾將長期積累的不滿轉化為變革的希望，可能成為是偏執民主（illiberal democracies）的警訊，正如塞爾瓦多的 Bukele 所體現的；也可能如阿根廷的 Milei 那樣，轉向了沒有確定未來的極右翼。

最終，普遍不滿的案例似乎在拉丁美洲最為常見。對民主的不滿、低投票率，以及社會將不滿轉化為變革行動的困難，都指向一個沒有明確變革視野的政治高度波動的情境。■

來信寄至：
Gabriel Kessler <gabokessler@gmail.com>
* 本文章的前一個版本發表在《民主評鑑》。

> 海地：國家的暮色

Jean-Marie Théodat，PRODIG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法國



出處：USMC，1922，Richard，來自美國，Openverse

一般來說，恐懼是威權政府用來壓迫人民、鞏固輿論的工具。然而在今日的海地，恐懼卻不是用來鞏固權力的工具，反倒是權力缺失的後果。因為正當性暴力壟斷的喪失，導致確保公民安全的統治權力，分散到了貪婪的個人手中。與此同時，長期遭受社會與文化排斥、財富分配不均的那些在社會上受壓迫的群體們，面臨著失落感。而這種強烈的失落感催生了反社會的暴力運動，也就是幫派。幫派的火力強大，連國家都難以擊敗他們。

> 暗殺、有罪不罰和恐懼

2021年7月7日，總統 Jovenel Moïse 帶著妻子和孩子的面被暗殺。根據目擊者的說法，受害者在被自動武器擊斃前曾遭受極大的折磨；因為，他身中十二顆子彈而亡。這聽起來過於瘋狂，幾乎像是一部B級片電影的劇情。而更駭人聽聞的是，兇手竟然能完全不費吹灰之力地輕鬆逃脫暴力現場。直到兇手回到基地時，他們才會被逮捕。顯然地，他們對於自己能逍遙法外的狀態感到非常自信，甚至沒有藏匿任何他們的武器。所以說，這些兇手究竟是如何在沒有任何阻礙的情況下，進入總統官邸的呢？這個問題與他們犯罪動機，同等重要。這些刺客竟可以在沒有引起國家元首保鑣的注目和警覺下，進出總統官邸。這次刺殺，是黑手黨式的行動，也是對目擊者的警告，要求他們保持低調。

> 備受質疑的選舉、衝突的持續以及治安的潰敗

在總統 Moïse 遇刺時，他並非一位受歡迎的政治人物。Moïse 於 2016 年當選，上任前的選舉過程有許多違規之處，臨時選舉委員會（Provisional Electoral Council，CEP）還因此迫使連續兩次重回計票繪圖板。臨時選舉委員會被指控貪污，以及大規模挪用 Petrocaribe 計劃下的公共資金。他們被指控長期影響政府決策，並被視為總統的替身。2010 年 1 月 12 日的地震造成了海地超過 90 億美元的物資損失，超過 25 萬人死亡或失蹤。

示威活動一般來說是從首都的較為貧困社區開始，接著擴展到有錢的人居住的 Pétiion-Ville 富庶區域。雖然一開始是和平的，但抗議活動經常演變成洗劫商店、搶劫倉庫，以及針對街頭店家的破壞行為。

2016年至2018年間，示威者與警察在太子港（Port-au-Prince）爆發了強烈的衝突，雙方交火的過程導致許多匿名受害者的死亡。與此同時，謀殺反對者並不會使得犯罪者被捕，或甚至受到任何形式的審判。因為這位國家元首本身，他也是以強硬的手段剷除對手的支持者，而他最終也會死在他用來鎮壓街頭示威者的劍下。事實上，像這樣完全依賴外部滲透者來服務、不服從民主的授權來維持公共秩序的權力，注定會消失。使用民兵和犯罪幫派來維持法律和秩序，反映出政府逐漸走向黑手黨式的治理方式；而同時也使得毒品走私集團逐漸在國家權威的行動中，成為了領導國家秩序的角色。

> 暴動、幫派和隨選謀殺

為了確保政府人員、全國各地重要的路線和入境點（港口、機場和邊境口岸）的安全，使用私人服務供應商成為武器交易商的特洛伊木馬。自 1995 年海地軍隊解散後，使得武器交易商更容易進駐。2018 年 3 月，La Saline 發生了一場大屠殺，這是首都最貧困的社區之一，也是許多反政府抗議活動的起點。當時，多達 80 多名民眾被幫派老大 Jimmy Chérizier 的追隨者殺害。有些人被屠宰，甚至被燒烤。回想起來，Chérizier 的母親在城市的步行道上販賣烤香腸時，人們就給他取了個「烤肉」的綽號。而到目前為止，政府尚未逮捕到任何人，也沒有任何公開調查，受害者的親屬則因害怕被報復，而始終保持沈默。

2018 年 7 月，抗議活動愈演愈烈，政府面臨暴亂和路障重重的街頭。儘管國家的聲譽掃地，首都的主要道路也被封鎖長達一週之久，但政府還是勉強保住了權力，而其代價是幫派策劃好的血腥鎮壓。在貧困的社區裡，恐怖的場面屢見不鮮。民眾發現自己成為了任武裝幫派擺佈的存在；幫派們謀殺、強姦、縱火焚燒居民，然而警方卻絲毫沒有任何干預的動作。2018 至 2021 年間，反對政府的人被有系統地謀殺，而犯罪者卻不用承受任何後果。Monferrier Dorval 於 2020 年 8 月 28 日被暗殺，Antoinette Duclair 於 2021 年 6 月 29 日被暗殺。前者是一名律師，也是太子港律師協會的主席，一名憲法專家；他曾對總統提出的公投修憲提案的正當性提出質疑。後者則是一名批判政府的記者。這兩名詳細被暗殺的狀況，至今仍不清楚，但種種證據都顯示了，似乎是皇室下令去暗殺他們的。

Jovenel Moïse 總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遇刺身亡的。Ariel Henry 擔任總理，執掌大權時，他的權力受到前任總理支持者的挑戰；而前任總理在謀殺案發生的前兩天，才剛被解職。從 2021 年 7 月到 2024 年 2 月，Henry 才下台；他的政府無助地看著 80% 的太子港都會區，被名為「Viv Ansanm」的犯罪聯盟武裝幫派接管。Viv Ansanm 的火力強大，他們總計有超過 600,000 件的作戰武器。Jimmy Chérizier 用鐵腕統治這個黑道集團，他在 2024 年 1 月對中央政府發動了第一次攻擊。而為了替自己的這個行動辯駁，Chérizier 聲稱自己是替受壓迫的民眾向政府發聲，他是他們的捍衛者。然而，Chérizier 在採用這種虛假的革命的語言的同時，他也在在首都最貧窮的這些社區（Bel Air、Delmas、Grand Ravine 等等）不斷地肆虐壓榨當地居民。

> 軍閥和總統轉型委員會的崛起

面對無能且腐敗的政府專制，部分反對派選擇在 2024 年 2 月要求總理辭職。當警方已經使用最大的力量來干預，但還是無法嚇阻示威者時，私人民兵就會被調來協助維持秩序。政府利用民兵作為輔助隊伍，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不遵守任何規則，更不遵守任何榮譽準則。民兵在貧困社區大肆屠殺，並將已經夠絕望的居民趕出他們想要控制的區域。昔日的幫派領袖，現在成了軍閥，並在城市的外圍制定自己的法律。Izo、Lanmò Sanjou、Tilapli、Chen Mechan 和 Barbecue，這些人的名字和政府官員的名字對大家來說，已經一樣耳熟能詳。與此同時，政府逐漸失去原本應該是協助他們建立工作的幫派的控制。

幫派的所作所為強力衝擊了政府權力的象徵，讓人擔心他們是否可能接管國家皇室。國家動盪不安，像是武裝匪徒阻止總理出國旅遊後返回海地，然後總理被迫辭職。總理的失敗，除了提供一個清除無能者的機會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國家權威體系的崩潰。這解釋了為什麼那些幫派份子現在在公開聲明中，要求直接地參與 2024 年 4 月 30 日成立的總統轉型委員會。Chérizier 那虛偽的革命言論確實引起了一些年輕人的共鳴，而這些年輕人也因為政治權力傾向犯罪暴力的狀態，而迷失了方向。

> 漂泊無依的國家

幻想破滅的程度、不平等的規模，以及找到解決極端貧富差距問題的難度是相同的。在海地，約 20% 的人口擁有了國家 65% 的財富；然而，最貧窮的 20% 人口只分到 1% 的財富。革命的時刻，彷彿已經到來；但大多數人卻拒絕加入革命運動，只留下了少數的狂熱份子，用言語與火焰表達他們對不平等且玩世不恭制度的厭惡。而來自郊區的勞動階級，因為太專注於日常的生存，沒有時間參加示威。至於中產階級，由於流亡（85% 擁有碩士或更高學歷的人都住在國外）而一無所有，因此他們也沒有參加抗爭，因為他們害怕那些被激怒的暴民會施以暴力。

寡頭政治在社會金字塔的最頂端，事實上是處於系統性的不穩定地位；而金字塔的底部則嚴重膨脹，為了繼續生存，寡頭政治與黑社會的界線逐漸模糊。許多商人和政客（包括參議員和眾議員）都參與各種販賣活動。無論是在與多米尼加共和國的陸地邊界、與牙買加的海上邊界，還是與加勒比海大陸各國（佛羅里達、哥倫比亞、巴拿馬）的空中邊界；海地都處於一個與非法武器和毒品經濟有關的網絡中心。這個網絡最終在海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中紮根，甚至滲透到公共場所。

> 往返不息，卻滯留在外

Jean-Bertrand Aristide 總統在 1994 年結束流亡回到國內時，解散了海地的武裝部隊。在暴力事件增加的十年後，由於聯合國特派團的存在，海地在 2004 年至 2017 年間經歷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時光。聯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MINUSTAH）有超過 10,000 名士兵和警察，為平息首都最動盪的地區做出了貢獻，但代價往往是非常血腥的。特別是巴西軍警所進行的「平息」，在記憶和牆上都留下了印記。國家警察在 2018 年只能指望 10,000 名現役警員。而據說由於美國政府暫時提供的免簽證移民美國的便利，所以吸引了人員叛逃，目前當地只剩 7000 人。

太子港都會區據說有幾百個幫派。2024 年 2 月，他們聯合起來，打著 Viv Ansanm 的旗號，由 Jimmy Chérizier（又名 Barbecue）領導，正如我剛才所說，衝擊了權力的所在地。他們襲擊了國家監獄，釋放了幾千名囚犯，其中包括長期服刑的罪犯；之後，他們繼續攻擊學校、警察局、教堂、圖書館和廟宇。他們真的在宮殿的台階上停了下來，因為首都的權力中心 Champ de Mars 成為了戰場，無論是字面上還是實際的情況上。

而「外圍國家」（首都以外的其他省份）相對來說沒有受到幫派暴力的影響。與首都不同的是，在外省，鄰里間的警覺性仍然是種障礙，也就是某些反社會傾向表現，由於社區團結仍然能對抗入侵者，因此犯罪也在此找到了敵對的溫床。

棚屋區已成為無處可依的地區，勒索、偷竊和強姦成為常規。城市人口外流已將這些社區的居民清空，迫使他們到外省尋求庇護。

而較富裕的社區並未受到影響，但上層階級的人們仍保持警戒：因為，他們是挾持人質者的目標，他們有可能在主要道路上埋伏攔人。

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似乎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向海地提供援助，因為他們害怕被捲入正在席捲全國的暴力漩渦中。受到最直接威脅的多明尼加人，正在僅僅超過 370 公里長的邊界上建造長達 160 公里的圍牆。而由於美國自 1962 年起對古巴實施禁運，古巴人被排除在外。美國——那唯一有能力對此情況產生改變和影響的國家——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阻止從佛羅里達運往古巴的武器販賣。正如我剛才所說，據報道有超過 60 萬件作戰武器在海地流通。美國反而選擇要求肯亞領導和平使命，而聯合國因為缺乏安全理事會的共識，已無法再接手。

面對全球化的犯罪，海地站在民主化的最前線。這個國家只能獨力應付類似黑手黨的網路和犯罪組織，這些組織在佛羅里達、南美洲和伊斯帕尼奧拉島都有強大的據點。他們也有能力動員國家所缺乏的財力和人力資源。

> 幻滅的孤獨

在 Jovenel Moïse 任期結束時所發生的零星動亂，其背後反映的是深陷結構性痛苦的人民，他們的憤怒與痛苦。海地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年 40 億美元的海外移民匯款滿足了最基本的糧食需求，但他們卻無法生產足夠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官方發展援助也不行。而官方發展援助卻佔了政府預算的三分之一。他們國家的生存有賴於移民匯款，以及友好國家預算援助的雙重挹注，但在國際捐贈者有其他優先項目需要推動時，他們國家的命運看似又離走向光明遠了一步。2010 到 2020 年間，通膨的增加，最貧困人口購買力因而受到了影響，這些最脆弱的族群因而流落街頭。來自 Cité Soleil、Canaan、Pernier 和 Carrefour 等貧困社區的年輕人，既沒有接受教育，也看不到未來的前景，他們因此成為激進政客和幫派的犧牲品。前者利用他們在暴力的示威活動中作為人肉盾牌，後者則招募他們進行殘忍的暴力行為。

在階級鬥爭的辯證法中，被邊緣化的人在領土層面上贏得了鬥爭。這些暴徒已經控制了首都最貧窮的社區，他們擴大了對市中心和通往外省的交通要道的控制，覆蓋了太子港都會區 85% 以上的土地。國家的崩潰，就源於這犯罪集團的管制。到了極端時期，黑幫在社會網絡上實行和上演的恐怖主義，已嚴重導致海地法律制度的潰敗。■

來信寄至：
Jean-Marie Théodat
<Jean-Marie.Theodat@univ-paris1.fr>

> 繪製衝突： 形構美洲「綠色」開採的相關爭議

Mariana Walter, Institut Barcelona d' Estudis Internacionals (IBEI), 西班牙和 Global Atla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EJAtlas)
Yannick Deniau, Geocomunes, 墨西哥
Viviana Herrera Vargas, Mining Watch Canada, 加拿大

在近期發表的一篇期刊中，我們紀錄並研究了一張專案地圖繪製的過程。地圖由「全球環境正義地圖集」（EJAtlas）、加拿大採礦觀察（Mining Watch Canada）、受影響的社區以及社會組織的研究人員共同製作，旨在記錄被認為對綠色增長以及相關的能源和數位轉型至關重要的金屬與礦物的開採如何擴張，並造成影響與所進行的抵抗行動。在這篇論文中，我們探討了形塑「綠色」開採前線擴張政治的各種機制與論述，並分析這些過程如何對全球化與去全球化（「在地化」或「回流」）動態帶來緊張局勢。

我們記錄了25起與鋰、銅及石墨開採相關的大規模採礦衝突，涵蓋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秘魯、厄瓜多、巴拿馬、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等九個美洲國家。超過30個組織和十多名研究人員參與共同協作。參與者攜帶不同的知識、經驗和技能，共同製作案例故事，並在「全球環境正義地圖集」中開發了一張主題地圖。



> 一場開採轉型

世界銀行於2020年評估在接下來的30年內，全球能源轉型將需要開採30億噸礦物與金屬，以避免全球氣溫上升超過2°C。目前，對銅、石墨、鎳、鋅、鉻、錳、鋰、鈷及稀土等金屬與礦物的需求正急劇增加，以支撐電網、電動車、太陽能與風能、電池等技術與基礎設施的發展。主導性的能源與數位轉型情境展現出對前所未有的大量多樣金屬與礦物開採的迫切需求。

各國政府與私部門為確保各類金屬與礦物及其供應鏈的緊迫行動，正在加速開採前線的不斷擴張，進一步加劇礦產資源開採壓力，並在全球南方引發更多抵抗，同時也在工業化經濟體內激化採礦衝突。美洲地區的開採緊張局勢尤為顯著，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記錄，該地區擁有全球已知銅、鋰、稀土、鎳和石墨儲量的重要份額。這兩大洲已經開採了全球大量的銅與鋰等關鍵材料。數十年來，拉丁美洲一直是全球三分之一礦業投資的主要目的地。

> 去碳化共識

主流的全球能源轉型路徑正推動去碳化與能源安全的發展，並引發這場新的全球商品熱潮。Breno Bringel 和 Maristella Svampa 提出了「去碳化共識」的概念，以描述資本主義內部正在形成的協議，即從化石燃料轉向以低碳技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他們認為，這一共識的論述基於這樣的觀點：為了應對全球暖化與氣候危機，必須透過生產與消費的電氣化，以及數位化來推動轉型。然而，這一共識不僅未能真正解決氣候與社會生態危機，反而加劇了這些問題，擴大了社會

資料來源：由 Y. Deniau 準備

備註：該圖顯示記錄的25個案例和所涉及的商品。灰點代表EJAtlas中繪製的過渡金屬和礦物相關的其他阻力運動，這些運動不屬於本次繪圖工作的一部分。



出處：Matheus Ribs，[@o.ribs](https://o.ribs)，2021

生態不平等，加劇對公共資源的剝削，並持續將自然商品化。事實上，正如多位行動者與學者（如 Lang、Hamouchène、Sandwell、Bringel 和 Svampa）所指出的，這一過程正在加劇能源殖民主義，並在全球南方開啟新一輪的環境掠奪。

「綠色開採主義」（green extractivism）這一概念的提出，描繪了一個矛盾現象，即是具有殖民歷史且對環境具破壞性的開採與累積模式，卻被宣傳為解決生態與氣候危機的方案（參見 Voskoboynik 和 Andreucci，或 Zografos 和 Robins）。同時，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與能源與數位轉型相關的開採活動，正對全球原住民族及其領土、生物多樣性與森林砍伐風險，以及人權造成嚴重影響。

> 地緣政治變遷與(去)全球化

考慮到當前「綠色」開採邊界的擴展——以供應「綠色」增長議程及其轉型——可以看到相互關聯的過程正在交匯。新冠疫情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引發對於確保關鍵材料和能源供應鏈控制的需求的增加。此外，新冠疫情還導致全球，特別是在全球南方的嚴重衰退和公共債務，並強化了開採主

義政策。事實上，社會組織已經揭露，新冠疫情被政府和企業利用來推動開採活動，將鄰近社區的健康置於風險之中，並加速批准爭議計劃，這些計劃未經充分的地方參與或協商，也未能有效地進行公共抗爭。

歐盟、加拿大和美國對於關鍵材料和供應鏈的依賴性與脆弱性進行的不同評估，指出了對金屬和礦物需求前所未有增加的挑戰，以及爭奪相同資源池的全球競爭。這些評估還顯示出對第三國（尤其是中國）在獲取某些材料方面的高度依賴。各國正在推動不同的國內和國際策略，以確保關鍵材料的供應鏈。此外，政府和國際機構強調，礦場的開發速度無法跟上對關鍵材料預測需求的前所未有增長；因此，推動了快速審核和許可流程的倡議。

為了確保關鍵供應鏈的安全，各國正在制定一系列國際投資工具。全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正大規模投資於關鍵金屬和礦物的開採，這些投資也涵蓋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BRI）。歐盟的國際工具包括涉及原材料的戰略夥伴關係、包含特殊能源和原材料章節條文的自由貿易協定，或全球網絡（Global Gateway）。目前，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國家正在進行協定相關的制定。

目前，各國正競爭控制各種礦產資源，以應對脆弱的供應鏈、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能源和經濟安全的展望，也包括軍事目標。這場競爭導致了保護主義和資源民族主義的加劇。此外，為了確保供應鏈的安全，對開採（和加工）活動的需求加速，無論是在舊有還是新開發的場地，無論是在工業化經濟體內外，礦業在曾經取代這些活動的國家得到重啟。然而，相關的影響和反抗正加劇對全球化（例如，供應鏈中斷和爭議的增加）和去全球化（境內轉包）動態的緊張局勢，從而突顯出當前增長和消費趨勢的限制，以及新一階段全球化可能面臨的限制。

> 繪製「綠色」開採邊界擴展的話語與機制

我們在此關注的繪製過程，記錄了一些正在塑造「綠色」開採邊界擴展的機制。在所考慮的案例中，政府、發展機構和企業將關鍵材料開採計劃視為積極且緊迫的地方性、國家性（發展、綠色轉型或安全）以及全球性（氣候與人類拯救、減緩或可持續性）目標。這些話語也將成為針對礦業中自私、不負責任或無知的行的抵抗框架。

然而，反向話語也在對抗並顛覆主流話語，挑戰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和社會環境不公。社會環境運動和原住民社群聲稱，他們的領土正被轉變為犧牲的體系，使得社群當中的社會與健康變得更加脆弱，並對敏感且未充分了解的生態系統、水源和文化遺產造成影響。儘管在全球南方，對當地抗爭者的犯罪化和暴力行為屢見不鮮，但在美洲各地，對不當和不良決策及參與程序的指控也隨處可見。在加拿大和美國，許可核發流程的加速引發了地方的不安。

儘管這不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但在專案中所繪製的25個礦業衝突，有20個影響了當地的原住民社群。這包括加拿大和美國所記錄的六個案例中的四個，這些大多是新計劃。當地原住民譴責正在塑造「綠色」開採邊界擴展的殖民主義模式，這些模式犧牲了人民和領土，並將人類的自然與文化遺產置於風險之中，而非拯救它。

許多記錄的案例顯示，開採邊界的擴展和社會生態緊張局勢在美洲各地加劇。許多已經承受長期且劇烈社會環境壓力的土地，正遭受影響和經歷衝突的加劇，進一步加深了分配不公的負擔。在阿根廷的Andalgalá，地方組織Algarrobo Assembly反對開發Agua Rica 和 La Alumbrera(MARA)銅和鉬礦的開採計畫。地方社群主要擔心水源以及冰川和冰川邊緣環境的影響。這些擔憂源於對Alumbrera礦場的過去的負面經驗，因該礦場運營了二十年，造成環境退化、水源污染和農地減

少。Alumbrera計劃引進處理來自35公里外的Agua Rica資源。然而，該地區已經面臨嚴重的水資源短缺，並且多次宣布水源、環境和農業緊急狀況。Algarrobo Assembly譴責該公司每天將消耗三億公升水：是當地12,600名居民用水量的六倍多。這個已經持續二十年的抵抗運動正面臨著暴力和犯罪化的情況。在加拿大，反對北美鋰（NAL）計劃的社群引用官方證據，指出現有影響和不充分的水文地質研究。在秘魯的Chumbivilcas，原住民社群報告稱，La Constancia 銅礦對環境和水源造成了嚴重影響。同樣，在智利，包括原住民在內的團體譴責 La Escondida 礦場，稱其對Punta Negra鹽灘地下水層造成了持續、永久、累積且不可回復的損害。

反對鋰開採的地方團體認為，環境評估和決策程序未能充分考慮各種礦業計劃的累積影響。在阿根廷，尤昌基金會（Fundación Yuchan）製作了一張地圖，圖中顯示位於Hombre Muerto鹽灘的多個鋰鹵水計劃。這張地圖旨在將焦點從單一計劃轉向土地本身，突顯對水系統的綜合壓力——他們聲稱這一方面在正式評估中被忽略。這一更廣泛的視角至關重要，更促使2024年3月法院裁定暫停新的鋰礦開採許可證。當地社群指出，儘管有證據顯示水源的可用性持續受到影響，例如河流和生態系統乾涸、動物遷移或死亡以及生計中斷，但新的鋰礦開採許可證仍持續被頒發。

這篇文章的靈感來自共同協作的專案地圖，此一專案旨在將分析重心從尺度視角轉移，檢視開採邊界在地方和洲際層級的擴展，以及地方與綜合性的影響、意義和背後隨之而來的抵抗。

> 最後提點

生態退化已引起廣泛關注，但對於「綠色」開採擴展的地方草根社會抵抗的重要性不應被低估。專家指出，隨著我們逐步接近關鍵礦物和金屬的短缺情況，環境、社會與治理因素可能成為未來幾十年金屬和礦物供應鏈的主要風險，超過直接的儲備枯竭。事實上，儘管當地社區和社會環境組織全球範圍內反對開採邊界的擴展，政府和金融機構日益擔心社會環境影響及對礦業的反抗對綠色增長與轉型議程所帶來的挑戰。這些衝突迫使全球礦業資源開採延遲或停止開採計劃，導致顯著的成本增加，包括由於延遲而造成的生產力損失，這些損失可能從數千到數百萬美元不等。大規模的社會動員迫使多個國家取消礦業計劃，包括西班牙、塞爾維亞、巴拿馬和阿根廷。同時，政治風險也非常高：在2023年，葡萄牙鋰礦開發中的貪污指控導致總理辭職。

此外，儘管本文主要集中於礦業開採，但整個供應鏈中也出現了緊張局勢，包括加工、運輸、處置/回收以及低碳能源的生成（如太陽能 and 風能）及基礎設施。在綠色增長情境下，前所未有的材料開採和消費壓力正將「綠色」開採邊界（及供應鏈）推向未知領域。這包括開採的規模和加速的擴大、影響的不確定性，以及探索新邊界的活動，例如深海或太空，無論是在全球南方還是工業化經濟體內。如我們所見，這一過程加劇了生態危機並激發了抵抗，限制了某些地區的擴展，並塑造了「綠色」開採擴展的政治。這種抵抗正在加劇全球化和境內轉包的緊張，突顯出不僅是增長和消費的限制，還有對新階段全球化潛在約束的挑戰。■

來信寄至：

Mariana Walter

<marianawalter2002@gmail.com>

*完整版本曾於2024年12月26日刊登於[Critical Sociology](#).

> 拉丁美洲 社會學協會簡要圖解

Miguel Serna, Universidad de la República, 烏拉圭

近幾十年來，社會學作為一個專業在各個領域和社會角色的畢業生數量與品質上都有所擴展。然而，面對經濟危機的反覆發生或持續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已經撕裂了社會結構，加上新的社會行動者的崛起，催生了對社會學研究的新需求。本文透過對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的比較分析，探討社會學從學術領域到專業領域的發展、其特徵與演變。

> 動盪的開端

拉丁美洲社會學機構化的過程是困難的，並且充滿了各種緊張局勢。其中包括對推動社會學研究持保留態度的意見、對學術自主性的需求、對公共承諾的要求，以及對學術生活國際化的關注。

然而，學術發展的倡議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中期，這一過程充滿了曲折的道路，經歷了各種制度性障礙、多種不同的步驟、進展與挫折。拉丁美洲的社會學家們開始在以培養傳統自由專業為主的學校體系中進行實踐。巴西則展現了不同的軌跡，其大學發展較晚，但受到北美模式的影響加速發展，設立了哲學與人文科學學院以及研究發展部門。在整個美洲大陸，社會學家們發展了一種學術實踐，其目標並不僅僅是教授和培養專業人才，而是根據科學方法的標準進行社會學研究的實踐。

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發展與拉丁美洲改革傳統的大學模式密切相關，這一模式的特徵是政治承諾和捍衛大學自主性，尤其是在與政府的關係上。因此，社會科學的歷史遺產及其背景將嚴謹的社會研究與對既定社會秩序的抗爭傳統結合起來，特別是在面對持續存在的威權政治體制和干預時，這些問題困擾著該

地區。自最近的民主化過程以來，社會學的學術制度化與專業化過程在面對日益增長的內外部社會需求時，正在重塑其遺產和實踐。

> 一個深根本土正經歷高速國際化的專業

社會學社群的形成是沿著雙重軸線進行的：一方面是社會學知識的本土根植，另一方面則是與拉丁美洲及國際學術空間的對話。社會學早期進入國際化的過程，明顯地表現在1950年同時加入國際社會學會（ISA）和拉丁美洲社會學會（ALAS）。此後，分別於1969年成立了拉丁美洲農業社會學協會和1993年成立了拉丁美洲勞工研究協會；此外，具有次區域性特徵的中美洲社會學會則於1974年成立。同時，社會學的國際化始終與其他社會科學保持著持續的對話，這一點表現在積極參與區域性網絡，如1948年成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LAC）、1957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FLACSO）和1967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社會科學委員會（CLACSO）。

有許多指標顯示出社會學學術社群的逐步形成（研究中心、大學、專業課程、專門出版物等）。然而，同時這一過程的實現和強化也得益於一群行動者、教授、知識分子和社會學專業人士，他們任職於不同領域、建立網絡和協會，並舉行公共集會，將自己類別和專業群體的知能貢獻社會。

另外，慶祝社會學家的官方紀念日也體現了拉丁美洲社會學專業社群的集體歸屬感。在智利，這一天是11月24日，紀念1982年智利社會學會的創立。在哥倫比亞，12月10日紀念該國於1882年設立的首個社會學講座。在巴拿馬，慶祝的日期是12月12日，以

紀念社會學家和作家Raúl Leis Romero，而在秘魯，則是12月9日，紀念1896年在聖馬科斯國立大學設立的首個社會學講座。最後，在委內瑞拉，2月11日紀念首個社會學與人類學會的創立。

> 社會學協會：主要目標與發展

為了呈現拉丁美洲的社會學協會的大致概況，本文根據以下標準對進行分類：a) 行動的主要目標，分為學術或專業領域，b) 成立時間和延續性，c) 地區範圍。

在針對協會性質（學術或專業）與時間變數（成立時間和延續性）進行綜合分析後，研究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實證觀察。從長期來看，協會的發展顯示出執行層面的緩慢且不均衡，儘管協會的數量和擁有協會的國家數量逐步增長。

另外，比較性的縱向分析使我們能夠確立三個具有特定特徵的歷史時期，與前述分析相符。拉丁美洲社會學的草創時期介於1930年代到1970年代，這一時期的特徵是社會學協會從學術領域的發展、網絡和在國家與區域層面的表現。隨後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協會擴展的時期，這一時期協會的專業性特徵更加突出，社會學專業的實踐逐漸從學術領域轉向大學外的領域。這一時期伴隨著畢業生人數的增長和非學術領域的專業實踐。最後，我們可以識別出跨越21世紀頭二十年的一個時期，其特徵是社會學家培訓的多樣化和制度化的鞏固（大學部與專業研究所課程），以及機構和協會在地區層面的深根。這一時期見證了許多國家學術與專業協會的逐步且並行的增長。

> 網絡、國際團結與學院及專業協會的興起

各種協會促進了多種形式的集體團結與網絡的發展，這為專業類別提供了多樣性的歸屬感和內部認同，例如透過建立團體成員身份或在社會學活動和大會上組織社交聚會等。此外，還有動員、倡議和對社會事業的公開承諾，以及捍衛弱勢社會群體的行動，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網絡中這些實踐都指向了國際團結。

具有專業或行會性質的學院和協會的興起，旨在捍衛、促進和強化社會學專業領域，這一發展較為近期。這些協會與社會學知識及其專業的公共合法化，以及專業實踐中的法律和規範進展密切相關。這些規範是異質且不完整的，從大多數國家缺乏專門的職業立法，到在多個國家（如阿根廷、智利、哥斯大黎加、秘魯和烏拉圭）存在嚴格規範的專業學會，規範範圍從國家層級到次國家層級不等。

> 當前的風險與挑戰

社會學的學術發展、協會的形成以及這一專業的實踐，絕非線性演進或進步的結果，而是面臨了多重障礙與挑戰。一方面，拉丁美洲的保守派對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抱持著懷疑態度，並將社會學家視為社會秩序的威脅。另一方面，新的社會需求對科學和專業知識的需求可能帶來風險，這些風險可能削弱社會學專業實踐中的某些關鍵層面。

此外，專業領域的變革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其中包括頒發大學學位和證書數量的增加與相對貶值，以及專業勞動市場的彈性和不穩定的過程。此外，遠端工作的興起，對照顧分工和性別不平等產生了影響，這在社會科學領域尤為明顯。由於認知到資本主義對生產力的日益需求，還存在將批判性特質和分析反思替代為過度重視軟技能和市場數據技術管理的風險。

對社會學專業的挑戰在於如何適應新的社會知識動態需求，同時不失去其批判性與社會承諾。這意味著要承襲拉丁美洲社會學的歷史遺產，包括對社會秩序深刻變革的承諾，以及反權威抵抗的文化。在這一時代變遷中，社會學需要扮演批判權力結構的知識分子角色，並公開譴責貫徹整個區域的社會不平等。此外，還需要恢復社會學的批判視角，將被邊緣化的社會問題和社會行動者凸顯出來，揭示促使權力機構與不平等得以延續的社會機制，並透過批判性反思質疑常規的簡化與自然化，對公共議題中反覆出現的社會問題（如暴力及其運用）進行深入探討。

領域	年度	國內所屬組織	區域協會
學術領域	1930-59	Brazilian Society of Sociology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Latin Americ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學術領域	1960-79	Colombian Sociology Association	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s Centr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Lati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ural Sociology
專業領域	1980-89	Council of Professionals in Sociology (City of Buenos Aires)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the Province of Buenos Aires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San Juan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Chile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Peru	
專業領域	1990-99	Panamanian Association of Sociologists Association of Sociologists of the University of Panama National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College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Panama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Uruguay	Lati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abor Studies
學術及專業領域	2000-09	Association of Sociologists of the Republic of Argentina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s of the Province of Mendoza Network of Sociology of Chilean Universities	
學術及專業領域	2010-09	Argentin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llege of Sociologists of Santiago del Estero Union of Sociologists of the State of Sao Paulo Union of Sociologists of the State of Rio de Janeiro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ologists Colombian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refoundation) College of Professionals in Sociology of Costa Rica Salvadoran Association of Sociologists and Social Science Professionals Honduran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Paraguayan Sociology Association Soci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of Paria College (Venezuela)	

表一

註：有些國家沒有國家層級的社會學學術協會，但擁有在國際學術界認可且長期存在的大學的社會學研究中心機構（研究所、系、學院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墨西哥。有些國家則同時擁有國家層級的協會和大學的研究中心，如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烏拉圭。

簡言之，社會學必須依賴「社會學想像力」作為一項基本的專業資源。超越過往的遺產、制約與挑戰，社會學協會與其專業技能或許正是社會學在社會變遷中的最大優勢。■

來信寄至：
Miguel Serna
<miguel.serna@cienciassociales.edu.uy>

*對於數據來源的審查，我要感謝來自ALAS社會學協會和專業協會網絡的同仁，特別是 Eduardo Arroyo（秘魯）、Ana Silvia Monzón（瓜地馬拉）、Flavia Lessa de Barros（巴西）、Alejandro Terriles（阿根廷）、Raúl González Salazar（委內瑞拉）、Briseida Barrantes Serrano（巴拿馬）、Carmen Camacho Rodríguez（哥斯大黎加），以及Mónica Vargas（智利）。

> 在危機和不確定時代中的拉丁美洲與哥倫比亞

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 (Lat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簡稱 ALAS)



出處：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 (ALAS)

自 1950 年來，批判性社會思想一直支撐著 ALAS 作為一種關切其時代的知識運動，在我們的大會上獲得了認可。多明尼加共和國大會是兩年籌備工作的成果，這些持續的努力旨在賦予社會學、社會科學、藝術與人文科學以歷史性和文明的意義。我們的非裔阿比亞亞拉美洲 (Afro-Abya Yala America) 既是加勒比的也是拉丁美洲的；我們的跨文化聯繫不僅滋養了性別、族群、區域與國家的多樣性，也不斷更新我們自主整合的挑戰——這種整合帶有對權力的殖民性 (coloniality) 的批判、同時具有解放性並向替代性的共存模式開放，後者拒絕一切形式的排斥、不平等與歧視。

作為橫跨所有地緣政治尺度的一個全球性、系統性

以及多重層面的現象，多重危機 (polycrisis) 是一個基於西方規則的世界秩序危機的結果。與此同時，我們也見證著新的多極主義 (multipolarism) 的緊急狀況，其中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可以在積極不結盟 (Active Non-Alignment) 以及爭取新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秩序的鬥爭的基礎上建立南-南關係。

這一背景加重了社會不平等以及殘酷的收入集中，並加速了前所未有的貧窮化進程。我們正遭受著去工業化、採掘主義、所謂的非正規經濟中的就業不穩定，以及透過剝奪而引發複雜積累過程的各種因素——這些因素對土著人民和非洲人後裔有著強烈影響——所帶來的折磨。

暴力是死亡的面孔，是對人權的侵犯，是數十萬人的被迫消失，以及數百萬移民在國內與國外的被迫流離。除了這一圖像，還有因經濟政策所導致的國家削弱，伴隨著由組織犯罪和權勢集團所導致的壞死政治的對應物。同樣地，以強化社會排斥、不寬容和歧視、男性中心的權力以及對被剝奪者和年輕人的污名化的傳統習俗，不斷地被重申，進而導致了社會的分裂。

我們的大陸正經歷著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和文化際性 (interculturality) 的社會環境危機。這場危機引發了關於自然資源及其私有化的，以及對開發與排除策略的主導權的激烈鬥爭。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認識到社會環境保護運動 (socio-environmentalist movements) 部署來自全球南方的生態社會和跨文化戰略的能力。

在最近的幾十年裡，女性主義集體行動——透過擴大和鞏固性權利及生殖權利、促使關懷社會 (society of care) 的訴求興起、並推動有利於這一目標的制度變革——推動了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性別關係的關鍵變革。

自 2019 年以來，社會爆發 (estallidos sociales) 開啟了對變革及替代性轉型的新想像和期待，其影響範圍與新局勢是批判性社會思想應該關注的重點，特別是在一個極右翼採取攻勢的背景下。最近在美國及多個拉丁美洲國家的選舉結果獲得了廣泛的民眾支持，同時也

加深了人們對其影響的合理擔憂，特別是關於白人至上主義、父權體制、種族主義者的民族主義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帶來的分裂性作用。上述趨勢加劇了對移民的迫害，引發了對該地區毀滅性的經濟戰，強化了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力量，並破壞了國家監管和任何可能的多邊行動的能力，以解決生活各個領域的嚴重的多重危機。

加勒比 ALAS 國際大會關注著對大大擴展了社會民主化的社會鬥爭成就的破壞。它反對：仇恨言論、武裝衝突中對暴力的正常化（naturalization）、對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公共權利的否定與蔑視、對公共抗議的刑事化，以及個人主義的極端擴張。

同時，它支持對公共教育的各種訴求，特別是對社會科學、社會學以及所有社群與祖傳知識的捍衛。

我們主張一種具批判性及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全球社會學能夠重新激活展現出社會學想像力的歷代社會學家提出的概念與反思。我們委身於烏托邦願景並聲援公民和人民的解放。

與此同時，新科學、科學革命、人工智能以及數位科技都應以非異化、不與消費主義掛鉤、敏感於自然以及能夠強化民主共存的方式被採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是那指向和平共存以實現人民和民族的美好生活的諸多身分認同以及包容性歸屬感的承載者；它們的使命是激進的和平主義，反對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滅絕，並在包括烏克蘭以及北非和南亞人民所遭受的所有武裝衝突，以正義和尊嚴促成和平。

面對上述提及的星球危機（planetary crisis）和不確定性，ALAS 作為在多樣性中團結的學術和社會表達的關鍵行動者，致力於在批判性思維的框架內收集其歷史遺產，以培養創造力並促進變革性社會學知識的生產，透過其實踐（praxis）擴大和深化社會和認知正義的普世權利。■

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ALAS）第三十四屆拉丁美洲社會學大會全體大會宣言，多明尼加共和國，聖多明各，2024 年 11 月 7 日。

